



著 勳 翊

# 編續幕內党來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蔣黨內幕續編

翊 勳 著

山東新華書店印行

蔣黨內幕 續編

著者 翊 勳

發行者 山東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出版

# 目錄

孫科派	一
「下詔罪人，破格用己」	五
「副總統」李宗仁	八
附錄（一）	
勝利前後	一〇
「百萬皇軍守護上海」	一〇
「共死團」	二二
日本投降了	二四
三位一體	二六
「新太子派」	二八

關於吳紹澍	二九
「忠救」與「中美合作所」	三一
「以毒攻毒」	三三
接收報館	三五
發了一筆大財	三七
湯恩伯與錢大鈞	三九
接收敵產與逮捕漢奸	四一
偽官可用偽學生要罰	四三

## 附 錄 (二)

CC派官僚資本	徐方略	四六
論「國營」及其他		五二
宋匪財富掠奪的驚人事實		五四
中國法西斯特務的血腥罪行	譚 樵	五六

孫科的眞面目	考	六六
「國防部長」的代價	高里遜	七三
孫匪立人是怎樣起家的		七五
周佛海如此說		七七
大公報的尷尬		七九
「大公」與「大剛」		八〇

## 孫科派

孫科是孫中山的獨養兒子，孫中山在世時，人家叫孫科的集團爲『太子派』，現在這個名稱已爲蔣經國的『建國社』所代替了。爲什麼孫中山在世時孫科已自成一派呢？這就充分說明他們父子之間並不一條心的。的確，他們父子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孫中山是廉潔奉公的，他的遺產僅上海愛利哀路一幢小洋房，還是華僑送給他的；但孫科則僅在廣州市長任內請了一二百萬（淨餘的），武漢政府時任交通部長，出售平漢路局地產，侵佔了三百餘萬，南京政府鐵道部長任內又有三百餘萬元公款沒有報銷，至於浮報侵佔的當然更多。此其一。民國十三年後孫中山實行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而孫科則背後反對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不久，即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蘇反共。此其二。蕭佛成會罵孫科『不肖』，說他『沒有一點像總理』。蕭佛成是右派，政治主張是反動的，但他對孫科的批評，却很正確。

孫科一生的主張與傾向，是變得很多的；民國十四年是國民黨的右派；民國十五年冬到十六年又是『左派』了，成爲武漢政府的中堅份子，蔣介石會要逮捕他。七月以後，他又與蔣介石合作反共，到南京做官。從十七年到十九年一直聯蔣反汪，二十年又跑到廣州去聯汪反蔣。二十年底，一度出任行政院長，被蔣迫倒，蔣汪合作同時上台，他在上海不斷發表談話：『獨裁要反對，雙裁也要反對。』蔣介石答應每月給他十萬元特別津貼，立法院經費從六折發放改爲八折發放，他就到南京去做立法院長。這以後，他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發起『中蘇文化協會』，似乎比較進步；同時他又制定充滿濃厚法西斯獨裁氣味的『五五憲草』。抗戰以來，孫科是積極主張聯蘇的，他到過蘇聯，從

孫科獲得很多贊助，被認為抗日堅定，傾向民主；而一九四一年則公開承認民主政團同盟和救國會爲「新漢奸」。以後直到一九四八年政協會議時還是扮演「傾向民主」的國民黨「進步派」，最後在偽國大制偽憲及蔣府「改組」中顯出了原形，爲蔣介石賣力反人民的代價，是被選爲「國民政府副主席」。

孫科的「善變」，正如西遊記上的孫行者一樣，但蔣介石給他戴了一個金箍，只要一唸「緊箍咒」，孫行者就伏伏貼貼地聽他使喚了。這個「金箍」是什麼呢？不是別的，依然是錢。孫科的所以善變，其關鍵在於「貪財」與「趨勢」，尤其是貪財一端起着決定作用，如民國二十年孫科離寧赴粵，聯汪反蔣，其主要動機就是因爲鐵道部的唐孫公款多數變成了孫科的私有，連連假賬也造不出如在大數目來，完全沒有方法可報銷，可交代，於是借着政治問題把所存公款囊括而去。廣東方面當然歡迎他去，增厚一分力量，決不會向他算南京的賬；南京方面已想不到他算賬，就是公佈或追究，人家也會認爲是政治上的報復，不肯相信。那時等軍事上由顧祝同與劉峙發連電，揭發孫科的貪污事實，但一般的反映，多數認爲是蔣介石因孫科政治上反蔣而故意編造出來打擊他的，是蔣介石度量太小，並不因此而增加對孫科的不良影響。蔣介石覺得孫科的貪財脾氣，所以就使出他的拿手好戲來，最後當然「有錢能使鬼推磨」，一個月十萬元的特別津貼，孫科就全心全力爲他「制憲」了。（到孫科就任立法院長後幾個月，這個特別津貼就有所變更，「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設立，似乎就是由此轉化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的經費，每月由行政院撥五萬元，上海市政府、廣東省政府各二萬元，南京市政府一萬元，總數恰合十萬元，這是一個跡象；又孫科私人應酬的各種支出，大都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館付賬的，中山文教館似乎是孫科的私人賬房一樣，這又是一個跡象。）孫科所愛的是錢，蔣介





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由宋慶齡出面領導作對外宣傳，籌募經費，孫科出了一千元，結果是寫了兩張收據：立法院五百元，中山文化教育館五百元。正因為各處，所以並沒有什麼可靠幹部。表面上看，孫科似乎自成一派，從民國十一年做廣州市長以來，部下却有不少人物，除吳鐵城已脫離孫科之外，有馬超俊、梁寒操、傅秉常、劉維熾、陳策、張惠長、黃漢樞、譚小岑、吳尚鷹、樓桐孫、陳長霖、吳經熊、衛挺生、陳伯莊、蔡增基、王崑濤、鍾天心等，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所謂屬於孫科系統的有一二十人。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如陳策、張惠長已為過時人物，不起什麼作用，在航空軍中既無勢力，也不能靠孫科而重握海軍、空軍權力；他們如想東山再起，則依靠孫科也無用處；不想東山再起，就無庸依靠孫科。吳尚鷹、樓桐孫、衛挺生、陳長霖等是立法官僚，胡漢民時代就當立法委員的，與孫科僅是職位上的隸屬關係。劉維熾、蔡增基是幫孫科刮錢的，自己也刮了不少，孫科做了立法院之後，他們不能靠孫科之力取得掌握財政經濟機關，就無所求於孫科。馬超俊、梁寒操已投向蔣介石嫡系的反動集團，梁寒操且成爲C.C.最反動的一翼，所謂「革新派」的活動份子；譚小岑則成爲C.C.特務。稱得上親信的只是有黃漢樞一人，因爲孫科的財產是黃漢樞經營的。黃爲美商花旗銀行買辦，民國二十年底到二十一年初的極短時期中孫科做行政院長，曾以黃漢樞爲財政部長（孫科做官刮地皮得來的錢，大部份委託黃漢樞匯到外國去的，所以用他做財政部長），孫科下台後黃漢樞當然也下台，就做了孫科的眼房先生，因爲黃既做過部長，表面上不好意思再做實辦了。

當孫科僞裝進步，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蔣介石對孫科的策略，一方面命令C.C.等從側面予以壓力，一方面却不能不用「草料」餵他一體。但當孫科公開反動時，雖蔣的確系一面在旁「喝采」捧

場，而蔣介石却只給孫科『草吃』，增加其『剩食』。孫科却不識這個道理，每當蔣介石對他不加重視時，他竟以露骨反動企圖取蔣的好感，他比政界更不如軍隊，試想：你反動豈能超過C嗎？正是『其愚不可及也』！

## 『下詔罪人，破格用己』

對於蔣介石的許諾，除大公報的『好話爲先生說盡，壞事爲先生說盡』兩語，一般被認爲中肯而恰當外，抗戰前南京會流行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下詔罪人，破格用己』；下聯是『勵精圖亂，發奮爲雌』。人們一看到這幾句話，很容易以爲是印刷工友排錯了字了；從來只有『下詔罪己』，沒有聽到過『下詔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沒有聽說過『破格用己』；大家知道應該『勵精圖治』，怎有『勵精圖亂』之理？司馬遷的史記上有『發奮爲天下雄』的話，『發奮』而又『雌伏』，就出於常理之外了。你覺得不合理嗎？蔣介石就是這樣的。

蔣介石統治中國逾二十年，造成重深的內憂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總是責備『國人不自振作』，『國人玩忽』，責備別人沒有照他的辦法、他的命令做，因此把自己弄壞了。甚至說舉國人民都沒有『國家觀念』，不知道『愛國之道』。一切責任都是別人的，從來沒有說一句他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對於國民黨及其政府與軍隊的種種罪惡及腐敗情形，他有時也在某些會議上講過，有時也似乎說得很沉痛，批評得頗爲正確，但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切責任都應由下邊的人負擔，都是小職員小幹部做錯的，從來沒有一個字說過他自己應負什麼責任，犯了什麼錯誤。（關於這一方面的例子，『蔣

介石言行跨通錄」裏抄錄了不少，不尚舉例說明。一愛或自誇戰爭的第一個半年，蔣軍被擊滅了四十五個旅，蔣介石於三十六年新年曾發去一個文件，對他自己戰略上的錯誤，一字不提，專責備其部下。的軍官沒有照他的指示去做。萊蕪戰役就是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而得到七十三軍四十六軍全部覆沒結果的，被撤職的却是岳岳。專制時代的皇帝，有時爲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肯下「罪己詔」，成湯有「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話；但蔣介石却是「一人有罪，罪在萬方」，照他的講法；他是「從來沒有做錯過事的」（實際上恰恰是「從來也沒有做錯過事」）。

蔣介石會肄業於保定軍官學校，修畢日本士官學校的功課，對軍事一門不能說他是門外漢，但對其他部門的知識與本領就未必都懂，更難說有所特長。然而他却有「本事」與「勇氣」做各式各樣的領導工作，從黨務、軍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財政經濟，無所不管。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國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譚延闓死後，他兼「行政院長」，後來因有學潮，又兼「教育部長」。那時有些有關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內「案據」之字又是「案據」，是「蔣中正呈蔣中正，蔣中正再呈蔣中正」；「案奉」之後又是「案奉」，則是「蔣中正訓令蔣中正，蔣中正再訓令蔣中正」。「九一八」之後到「七七」抗戰，他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長」、「陸軍大學主任校務委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中央航空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大學（國民黨黨校）校長」、「警官學校校長」、「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汪精衛逃出國後又加「行政院院長」、「國民黨」中常務副主席、「中政常副主席」、「航委會委員長」。抗戰以後，除上述各學校的校長照舊外，總的方面爲「最高國防會議（後改稱「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林森逝世後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方面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航空委員會委員長」；行

政方面爲『行政院院長』、『軍地黨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四川省政府主席』；義務方面爲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央設計局』及『黨政考核委員會』主委；『民意』機關方面則爲『國民參政會議長』；財政金融方面則爲『四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聯合總管理處主任』、『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教育方面則一度兼任『中央大學校長』。黨政軍民財政教育各部門的『最高』職位，都由他一人包辦，那時不少人捧他稱『最高領袖』，原來他的所以成爲『最高』，就是那樣得來的。

蔣介石執政二十年，與內戰相終始（僅抗戰初期停止過一二年，以後即不斷磨擦），禍國殃民，罪惡滔天。但蔣介石本人却是很『辛苦』的，你只要看他擔任上述數十種職務，就可見其『勤勞』了！他不相信別人，只有自己兼上，兼上就多少要費些精力（如抗戰中兼行政院長時一天批五件公事，其餘山孔祥熙辦），不是空擔虛名的。可是他爲什麼『辛苦勤勞』呢？爲的是『殘害人民，開門掛盜』！

蔣介石一生善於裝腔作勢，好像他真是爲國爲民，民國二十年十月在南京對請願抗日的學生說：『三年以內如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侵略者出中國，就殺我蔣中正的頭！』以後不斷搞這樣運動，搞那樣運動，也都裝出要發奮圖強的樣子，事實上則『不抵抗政策之後，連接來的是『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通車通郵，事實上承認僞滿』、『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敦睦邦交令』、『華北特殊化』、『張川越談判』、『七君子下獄』，直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還是『和平未至最後絕望，決不做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原來『發奮』的姿態，是爲了便於『屈服』。

## 『副總統』李宗仁

正當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聚攏各戰場蔣匪軍，勝利地展開攻勢時，南京的蔣家小朝廷扮演着一幕所謂『行憲國大』的醜劇。這一幕醜劇是蔣記國民黨及蔣介石本人臨死前的最後一場戲，和袁世凱的『高皇帝大皇帝』一樣，是蔣介石的『飾終典禮』。這齣醜劇中緊張驚奇的場面，是蔣介石聲明不願做『大總統』，放棄競選，並提議推胡適為候選人；『國大代表』要求槍斃陳誠；而最緊張最精彩的場面，則是『選舉副總統』，經過四次投票，纔把桂系首領李宗仁選出來。這三件事情是有連帶關係，環繞着一個中心發生的——這一個中心就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蔣介石集團已迅速走上沒落崩潰的道路，連美帝國主義者也認為蔣介石這個奴才頭子太沒有用，準備拋棄他而另換一個新的奴才頭子。美帝國主義心目中的新的奴才頭子候補人，就是偽國大投了四次票所選出的偽副總統李宗仁。

蔣介石近十餘年來的最大希望就是做上『民選的正式大總統』，使他的獨裁專制『合法化』；從『五五憲草』的製定之日起，蔣記國民黨的一切關於『憲法憲政』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從『由蔣介石任大總統』的預定前提出發的，製定偽憲法，包圍偽國大，一切都是爲了蔣介石坐上『總統』寶座。在偽國大開幕前後，所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以及所謂『社會賢達』等幾千名奴才中，沒有人肯出面作陪客，做『總統候選人』（最後才拉上一個居正陪襯一下），爲什麼這樣呢？大家都知道『總統』是蔣介石的『禁燭』，蔣介石固志在必得，別人是不能染指的。偽國大開幕之後，蔣介石的『總統』馬

上可以說到了，爲什麼他要聲明不願作候選人呢？

一般的觀察，是蔣介石藉此自抬身價，取得廣泛權力；果然在各地奴才們通電呼籲，一致「推戴」之後，蔣介石就「俯就輿情民意」，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應選」了。這和民國四年爲國民代表上書勸進「推戴大總統爲今上皇帝」，袁世凱「謙讓」三次而後就，是同一手法。這種觀察，說明了蔣介石裝腔作勢，以退爲進的作用的一方面，但僅是淺顯的一面，而不是其作用的全部。蔣介石裝腔作勢的主要作用，却在於下列兩點：第一，做給美國帝國主義者看，他得到「全國的擁護」，非他做「元首」不可；使美國主義者感到必須繼續支持他，如不支持他而支持、扶植別人，事情就更不好辦。第二，做給準備代替他的人看，好像說：「你看，我的勢力多大，聲望多高？你難得美國主子的支持，要想代替我，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如早些收篷爲好！」

遠在偽國大開幕之前，美國當局在商討援蔣貸款時，馬歇爾和杜魯門都會發表過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和談話，內容都涉及蔣政府的基礎問題，而且國務院的發言人又一再加以解釋，（先說在中國政府的聯合政府並非必須包括共產黨在內，以後又說也並非美國主張一定不包括共產黨在內）。國務院官吏對其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言論作帶有修正性的解釋，在國際慣例上是很少見的，甚至可說是一種失態。爲什麼會這樣呢？主要是爲了表示對於蔣介石政府的不滿，含有「取瑟而歌」的意思。到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援蔣貸款五億七千萬美元的時候，參院外委會發表了一個報告書，嚴厲批評蔣介石政權的貪污無能。南京的奴才們看到後有些驚惶失措，認爲這個報告書對蔣政權政治上打擊之大，決非五億七千萬貸款所能抵償；過了幾天，參院議長兼外委會主席范登堡發表聲明，收回這個報告書，理由是「這個報告有些過分地方，發表之前沒有經他同意，不宜發表。」他但却說報告書中關於

軍事部份的批評是當實詞，這一部份不要取消。表面上范登堡似乎是爲了保留蔣介石一些面子，不要使他太難堪，實際作用並不如此，因爲蔣介石失敗的決定點就在軍事方面，軍事上的無能與失敗，注定了蔣介石集團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范登堡聲明雖在尾巴上拖上一句爲蔣介石捧場的話，其作用等於把小孩子打了一頓，小孩哭了，於是又去哄他：『乖乖，不要哭了，以後好好聽爸爸的話，爸爸還是歡喜你的。』可是言外之音，却含有『如果再不聽話，那就要打得更兇』的意味。

美國反動派對蔣介石『一面斥罵一面喂』的作法，除加緊鞭策蔣介石（『你再不好好幹，老子就不要你了』）之外，還含有對被培養作蔣介石替身者打氣的作用，爲將來摔掉蔣介石這個奴才另換上其他傀儡時預作輿論準備，心理準備。因爲蔣介石獨裁專制二十餘年，在反動陣營中建立了高度的『權威』，從來不允許有一個人能形成『第二人』的權位威望的，無論資望地位如何高，只要蔣介石感到足以威脅他或使他不能運用自如，蔣介石可以隨時拘囚、殺戮，不能公開殺的就暗殺；因此美帝國主義需要鼓勵被培養代替蔣介石者的勇氣。又因爲蔣介石是中國反動集團的最高代表人物，『取精用宏』，根深柢固，幾乎已成爲反動集團的唯一代表者，美帝國主義要撤換他，會引起反動集團的絕大混亂，許多反動份子會意味到『蔣介石尚無辦法，別人當然更無辦法』，於是動搖，沮喪，分化，退却，而加速其失敗與死亡的過程；所以美帝國主義者要適當地削弱蔣介石的政治威信（這是對反動集團講的，蔣介石在人民中早已毫無威信可言了），使一旦要摔掉他時可以減少驚慌失措的程度。

當然，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一切聽主子安排的，但當主子要攆走奴才時，奴才爲挽救被逐的惡運，會特別賣力以顯出其能幹，表示他還能爲主子做很多有用的事，比其他奴才更有用些，以爭取主子回心轉意。這就是蔣介石『不願做總統』的主要作用，當這消息驚人消息一傳出，蔣黨所把



持的各地各名團體，紛紛馳電，選舉蔣主席爲第一任總統候選人的時候，蔣辭職之下，由金陞大（美國教習部的）與中央大學教授却聯名發表文件，懇請蔣介石不做總統是一個英明決定，說：蔣如能脫離國事，到美國和黨居之遊歷遊歷，對中國前途與世界和平，都有益處。這句話表面上似乎並不激烈，實質上就是說蔣介石應該下野出洋，如果再做「元首」，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害處。在南京的太學教授們竟敢對專制魔王蔣介石說這種煞風景的話，是不能想像的，除非他們得到司徒雷登的積極支持，否則不是沒有如此大膽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對蔣介石不做總統的表示，幾乎一致讚揚其誠意，也說如果蔣真不做總統，對中國是有利的，對蔣介石的裝腔作勢實質上是喝倒采。

僞國大在解放軍解放洛陽，收復延安，圍攻瀋陽……一連串的勝利聲中舉行，奴才們人心惶惶，蔣介石爲安定奴心，特作了一次撒謊天大說的報告，說兩年來戰爭中蔣軍只損失十分之一，而且已補充上了，共產黨不僅六個月不能肅清全國，六年也不可能；相反的，他能在六個月內「肅清黃河以南的共軍」。這一套騙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的話，引起蔣管區人士極大的震動，因爲誰都知道這裏面沒有絲毫真實性的東西，漲頭漲尾是謊話；爲什麼不講一句真話呢？一定是一句真話也講不得，所以只好全講假話，局勢的嚴重就可想而見了。僞國大代表對蔣介石的話不敢質問，對白崇禧的軍事報告就引起軒然大波，絕大多數「代表」拒絕聽其他僞部長的報告而要求先檢討白崇禧的軍事報告，在檢討中，許多人要求把準備到美國去「療病」的陳誠扣押起來，「槍斃以謝國人！」蔣介石的嫡系CC和復興系本來企圖在軍事報告檢討中打擊桂系，結果一涉及實際問題，被當作「衆矢之的」者是陳誠。陳誠是蔣介石手下最大最親信的大將，僞國大代表要求槍斃陳誠，說明蔣介石在反動派陣營中已失去絕大多數人的信賴了。

「副總統」候選人共計六個：孫科、李宗仁、程潛、于右任（以上均國民黨），莫德惠（「社會賢達」），徐傅霖（民社黨）。四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投票結果，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孫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潛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餘票。李宗仁得票最多，但不足「法定」當選票數（一五二三人）的一半，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李得一六三票，孫得九四五票，程得六一六票。當晚程潛聲明放棄競選，據說是「奉令退出」（合衆社）；接着李宗仁也聲明放棄，理由是「選舉沒有自由，有某種壓力施於國大代表，致不能自由投他的票」（合衆社南京二十五日電）；同時孫科也聲明「爲肅清外間流言，清除誤會」而放棄競選，據合衆社說：「孫科的退出競選，是由於美大使司徒雷登的勸告」（同上電）。需要澄清的「流言」是什麼呢？路透社二十五日南京電稱：「寧市昨日標語紛傳，大批傳單斥責李宗仁預定於當選副總統之後即發動政變，迫蔣下野。並傳此項傳單的主謀者爲孫科。李方發言人稱，蔣正以一切力量助孫科競選。」同日中央社的闢謠電中也供認：

「京市今日謠言蠶起，其最足引起誤會者，爲「新民報」所載交通服務社之啓事，其中竟謂蔣與李政見不合，彼此心理難免不相協調，蔣不願支持李宗仁；又謂國民黨某有力人士欲藉黨權使某人（按指孫科）競選成功，並指某有力人士即陳立夫；更有人竟謂蔣不時將邀歐訪問，李如當選，對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件。……」

中央社是專門顛倒黑白的，它所要闢的謠言，什九是事實的真相。因爲李宗仁的退出競選，造成南京的混亂，國民黨中執會，僞國大主席團紛紛開會，派遣代表請求李、孫、程收回放棄競選，以「完成行憲大業」，合衆社二十七日電稱：

此間觀察家一致認爲：李宗仁退出競選，以便其競選地位無從增進；其目的在於使蔣介石之威脅，乃是一種手段，目的在達到預期之結果。此種手段，已獲得下列結果：（一）使國民黨對選舉行使壓力問題公開化，迫使該黨不得不重申在競選中的「中立」地位；（二）使蔣介石不得不親向李宗仁請求其繼續競選，給予李氏的面子不少；（三）因蔣既表示擁護李，實予反李者以嚴重打擊。衆信如李宗仁果真退出競選，則將使一國大「跨台」，並可使國民黨分裂；故國民黨及蔣介石不惜一切力量公開贊助李之競選。」

經過這一場波折後，僑國大二十八日進行第三次投票，二十九日作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壓倒孫科的一二九五票而當選爲副總統。

這一醜劇說明了下列幾個問題：

蔣記僞憲中的「副總統」是毫無權力的，比美國的副總統更沒有權力（美國的高總統選是參議院的當然議長），只有當「總統」出缺時，由「副總統」繼任。如果「總統」沒有意外，「副總統」就是「伴食中書」，不及一個省政府主席或部長重要。爲什麼值得如此費力競爭呢？當然不是爲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虛名，而是意味着蔣介石下野的可能性頗大，當「總統」出缺時可以繼任總統，掌握政權，誰取得「副座」，誰就能在不久的將來「取蔣而代之」，所以要出死力相爭。此其一。

孫科的競選是得到蔣的全力支持，並由陳立夫動員與壓迫國民黨員不投李宗仁的票而投孫科的票，所以李宗仁要揭穿「沒有自由」的內幕。孫科也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政治上是有野心的，蔣介石爲什麼不怕他而支持他呢？因爲孫科已喪失了自樹一幟的地位，沒有「取蔣而代之」的可能，孫科當

「副總統」，恐不感到威脅。蔣、陳的以全力支持孫科，說明李宗仁當選了，就將威脅到蔣介石，「政變」的傳單，與「蔣不時將遊歐訪問」的謠傳？不是毫無根據的「危詞」而是有可能性的。此其二。

李宗仁是一向不肯露鋒芒的，他很難悉蔣介石「不能容人」的性情，十餘年來一直裝着「忠厚無用」的樣子，唯恐遭蔣之忌，如民國三十年夏白崇禧決定將香港的珠江日報「復刊」，去徵求李宗仁的意見，李堅決主張不要復刊，說「現在決不要讓別人感到我們廣西還要做什么事，愈少做事愈好。」這次居然一變過去「雌伏」的慣例出而競選「副總統」，而且竟敢揭穿蔣介石、陳立夫為支持孫科所採取的行動，公然向蔣介石採取攻勢，先後判若兩人，這是什麼道理呢？根據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於美帝國主義對他撐腰；他的出面競選，本來是司徒雷登親自到北平去勸出來的，特別是在李宗仁聲明退出競選之後，司徒雷登馬上對孫科行使壓力，「勸」孫科也退出競選，造成僵局，致蔣介石、陳立夫不得不對李宗仁讓步，這一着對於李宗仁的「當選」是有決定作用的。因為：程潛既「奉令」聲明退出（當然是「奉」蔣介石的「令」，別人既無權「令」他，程潛也不肯聽別人的「令」），程潛的票子也一定「奉令」轉移到孫科名下，所以李宗仁會說「沒有自由」而以退為進，聲明退出競選，這時候，蔣介石、陳立夫等可能表面上敷衍李宗仁，一面却繼續進行選舉，那末孫科成了唯一候選人，就勝算可操，當此要緊關頭，司徒雷登馬上出面干涉，壓迫孫科退出，才造成有利於李宗仁的條件。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李宗仁已成為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第二個乾兒子，而且「洋爸爸」對「第二乾兒子」的照顧，比對「第一個乾兒子」（蔣介石）更熱心些。「有了小兒子，就不疼大兒子了！」美帝國主義是否就拋棄蔣介石，現在還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但已顯出這個傾向是毫無疑義的，此其三。

美國民主黨爲什麼看中李宗仁呢？先看美國新聞界（國務院專電）電訊中對李宗仁的報導：  
紙對李宗仁怎樣捧場：

「紐約先驅論壇報」稱：李宗仁的當選，乃顯示一主張革新份子榮獲一崇高之地位。……李向來即要求一誠實有力之政府，先得人民之支持，然後即可能擊敗共產黨，故李之當選不宜忽視。」（華盛頓四月三十日電）

「克利扶蘭俄亥俄」正言報「五月三日社論稱：過去幾個月由各方來的消息，所說的無非是國民政府軍事上的收績和國民黨政治機構的繼續腐化與霸佔，上週國民大會推選李宗仁將軍爲副總統，確是一個難得的好消息。……他一向爲和平中國作戰；他有很豐富的政治經驗；……知道忠實的政府所應做的事情；他知道中國在反抗共產黨方面獲勝的唯一希望，乃是儘可能提供最好的政府。李宗仁將軍希望獲悉各方面的意見，這在向來是百分之百以國民黨固步自封的政府界中，是一種新的傾向。他堅持實行基本的軍事、經濟、政治改革；這種行動，蔣介石曾避不採取。李宗仁將軍並不是蔣介石「唯命是聽」的人，他對中國有見解，也是二十年來統治階級內部最好的見解。」（同上五月四日電）

「費城日報」五月一日評論稱：……李宗仁將軍代表國民黨內部反動份子的反對派；這些反動份子是中中國行政系統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他們阻撓馬歇爾國務卿的努力……」（同上電）

美國反動派爲什麼這樣捧李宗仁呢？因蔣介石已失盡人心，沒有希望了，在中國反動陣營中選來揀去，只有李宗仁還可能起騙人作用，所以捨他出來使一些害怕革命的人們對此發生幻想，使中國反動派可以重新組織力量。其次，中美反動派已選擇兩廣爲最後負隅之所，但兩廣人民過去吃了蔣介石

集團很多虧，蔣介石要退到兩廣去，是不可能見容於兩廣人民的，宋子文雖是廣東人，也無能爲力，而李宗仁在兩廣多少有些潛勢力，尤其是抗戰以來李宗仁一向在外面，一切危害人民的事不能算到他的賬上去，容易起欺騙作用。第三，李宗仁與李濟琛的私交素好，如果李宗仁把蔣介石擠下了台（這當然要由美國主子決定），有拉李濟琛合作的可能，於是李宗仁就成爲美帝國主義者武庫中最後的一件法寶。

這個被美帝國主義者稱爲「一向爲和平中國作戰」的李宗仁「將軍」，最初是廣西大土匪陸榮廷（袁世凱時代的廣西將軍）的部下，後來則爲陳炯明的第一員大將林虎的下屬，（陳炯明的三員大將，第一名爲林虎，第二名爲葉舉，第三名爲洪兆麟。）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出師桂林北伐，李宗仁在西江上游襲擊大本營的船隻，打翻了幾隻，這就是他「爲和平中國作戰」的開始。民國十四年國民革命軍肅清了陳炯明的全部勢力，收復了東江和南路，李宗仁看到大勢所趨，才投降廣州的國民政府，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北伐以後，李宗仁駐武漢，武漢成爲屠殺民衆的最大屠場，殺人之衆多與殘酷，比起蔣介石在上海南京的「業績」還要超過幾倍。抗戰後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廣西軍在五戰區的不少，對抗日毫無足述，害民則首屈一指，強姦、搶掠、殺人、放火，甚至比日本鬼子還厲害！民國三十年春，國新社記者李洪踏過安徽壽縣，桂軍旅長聽到有一新聞記者路過那裏，怕他遇敵潰逃和蹂躪民衆的真相被記者報導出去，當夜就把李洪活埋了！這種事情，在抗戰時期是任何反動部隊所沒有的，只有李宗仁「將軍」的部下才做得出！李宗仁自崇禎所統治的廣西省是有「模範省」之稱的，據說廣西的民衆是最有組織的，地方自治有成績，民衆自衛的力量很強；抗戰時期經過了兩次考驗：第一次是敵人從欽廉進攻南寧；西至龍州，南渡邕江；第二次是民國三十三年從衡陽

進攻桂林、柳州。廣西的地勢是一無地無山，無山無水，阻擊與困擾敵人是較有利的，然而敵人二次進兵，幾乎是如入無人之境一樣，桂林的保衛戰，不到五天就全部潰敗，連敵人也想不到有這樣容易。

桂系軍閥的頭子李宗仁，其反動的經歷與腐敗無能，與人民公敵蔣介石如半斤與八兩，毫無軒輊，中國人民是認識得很清楚的。

空白页



附

錄

(一)

## 勝利前後

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紅軍長驅直入偽滿及朝鮮北部，日寇受到致命打擊，即接受波茨坦宣言，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處於日寇鐵蹄下達八年之久，忍飢耐寒，窒息下氣的上海人民，興高彩烈，歡欣瘋狂，滿以為從此重見天日，可以揚眉吐氣！然而『不戰而勝』的國民黨統治者所帶給他們的，不僅和敵偽『如出一轍』，而且變本加厲的剝削與掠奪。人民所期望的是一出水火而登衽席，結果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有人說：『本來是『黑夜』了，却又遇到『晝晦』。』本文所要寫的就是日本投降前後四個月內，也就是『黑夜』和『晝晦』之中的上海一角的形形色色。（編者按：本文作於一九四五年底，曾於是年十二月的華中新華日報連載。）

### 『百萬皇軍守護上海』

自從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德國崩潰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如何，已是大家所能斷定；問題祇是日寇還能掙扎幾多時日。到琉球島的戰役結束，日寇的崩潰期更爲迫近。從那時起，上海一般人士所探詢、研究、猜測的是：蘇聯會不會提早參戰？（蘇日中立協定雖已由蘇聯通知不再繼續，但滿期還要等到明年四月。）美國軍隊究竟先進攻日本本土？還是先在中國沿海登陸？如果在中國登陸，則先在華南登陸呢？還是先在華中——上海及其附近？最關心的還是上海會不會成爲決戰之所？

這並不是過慮，的確有許多事實呈現於人民面前的：在大湖三角洲一帶，敵人集中了七個師團，上海四周就有了五個師團，市郊以及郊外，到處都挖掘工事，所有空地上都挖成無數的墳坑，有的構築成炮位或機槍陣地，有的則掩藏食糧及軍需品等。因為根據日本各都市被轟炸的經驗，食糧被焚燬的威脅最爲嚴重，所以他們要分散掩藏於空地。市內各馬路的人行道上，每隔四五丈就挖掘下半個人深的小坑，下雨時及雨後就積滿了水，晚上行路稍不小心，就會跌進去。（因永久防空，路燈少而且弱，所照的面積不到方丈。）上海向來流行的話，是「馬路如虎口，當中不可走」，一變而爲「路旁不可走」了。那樣的小坑，據說是備戰用的，山下奉文指揮菲律賓潰奔時，在馬尼刺爭奪戰中曾靠這些小坑大大阻礙了美軍的進展。上海馬路上的無數小陷阱，正是日軍準備毀滅上海的無言告示。上海四郊，則到處張貼着「百萬皇軍守護上海」的日文標語，及號召上海及四郊日僑全體參加戰爭的宣傳品。

據傳說：希特勒德國失敗後，日本就有人主張早日投降，以保存實力，利用並挑撥美蘇之間的矛盾而重振旗鼓。他們公開宣傳着：「如果希特勒在一年以前就投降——甚至是無條件投降，德國既不會敗得這樣慘，也不至於完全由人擺佈。」日本所有都市受到大轟炸以後，這一主張在首腦部已佔優勢，但陸軍將領則一般地反對投降，主張作戰到底。特別是駐華陸軍，主張更爲激烈，他們主張必要時放棄日本本土，遷都朝鮮或滿洲，以鮮北及滿洲的工礦資材爲憑藉，在中國大陸上與美軍決戰。他們認爲這樣還可以打他二三年。據傳說：日本大本營會派一高級人員（一說爲日皇裕仁的胞弟秩父宮親王）到上海來徵詢駐華陸軍將領的意見，在登都隊（第十三軍軍團）司令部開會，登都隊所屬七個師團的師團長，全部反對停戰；席間有人拔出佩刀，斬下自己的手指，說：「要排除議和論調，像被

去這個手指一樣肅然！」後來這七調師團長都奉召回國，其中駐紮在蘇州的小林師團長即在返日途中被美國飛機打落墮海。

### 『共死團』

七月十八日起，美國飛機對上海市區作了四次以上的大轟炸，死傷的十分之九是平民，燬損的也多數是平民的房屋財產。這倒不是沒有目標或找不到目標，而是爲了敵人的一切軍事機關都已遷入市區，嵌在居民稠集之所，如浦石路邁爾西愛口十三層樓的華懋公寓，成爲登陸部隊的司令部（原來在市中心區）和華中派遣軍憲兵司令部（原來設在南京）；愛多亞路的浦東同鄉會大廈、靜安寺的平安公寓等都成爲重要軍事機關；以辣斐德路馬斯南路呂班路環龍路爲界的顧家宅公園（俗稱法國公園）和震旦大學，都是日本的軍需品儲藏所。七月中旬日本軍部更下令徵用一切五層樓房以上的建築，限令此類大廈以內的商號住戶遷讓。如南京路的慈淑大樓（大陸商場）、西區各較大的公寓，都接到此項通知。

這幾年來，因日本軍政經濟機關佔用的房屋很多，上海的房屋恐慌已極嚴重。那些被遷逐出大廈的人住到那裏去呢？於是紛紛找門路請求延緩出讓。日本軍閥居然網開一面，應允各大樓的最高一層可以留給中國人居住，有的則允許最下層的舖面可以緩讓。爲什麼日本軍閥肯給予這些『恩典』呢？它的所以徵用各鋼骨水泥的大建築，是爲了防禦空襲，如果這一建築被中型炸彈炸中，也祇會炸穿一層，那末炸死的是住在最高一層的中國人，他們自己還是安全的。據說十三層的華懋公寓，其最高兩層並不居住日人，而是作爲一部份英美僑民的集中營的。他用這一辦法向美國表示：『你來炸！反正

先炸死你自已人！」

這許多高大建築對於上海市民的每一部份，都是上海市民的安全地方。如果要轟炸日本的軍事設施，那就必然要殃及鄰近的平民。虹口塘山路附近的死亡數千人，就是爲了轟炸日本的煤油廠未中而遭殃的！如果炸彈直接命中各大藥房，則大藥房裏沒有炸壞，而附近的普通藥房就可能先被震垮了！日本當局如此與華人「親善」，對上海華人的威脅是難以形容的。日寇和漢奸常常說：「同生共死」和「東亞共榮圈」，上海人民至此即稱之爲「共死圈」！平時日本人吃得肥胖的，中國人則連雜糧也配給不到，餓得剩一張皮，但事到臨頭，却非要你「共死」不可！而且在這「共死圈」之內，日本人恰住在最堅固的建築裏，以圖倖存，所以又有人稱之爲「共死圈」中的「倖存點」。

七月中下旬大轟炸之後，市民死傷的很多，許多受傷的難胞赴醫院求治時，日本軍管理的許多大醫院，如山東路的仁濟醫院等，都拒絕收受，醫院中雖明明有舖位，但非先繳偽幣三十萬元不讓受傷者進去。而且在四五小時內，接續漲價，從三十萬元而六十萬元，而一百萬元，但也有熱心的醫院。則凳子上都躺滿了傷胞，把被單撕開作包紮紗布，事後偽府及所謂社會名流也曾組織團體，商量籌款救濟。但除偽新中國報接受讀者捐款，立即散發了二千餘萬元偽幣之外，其餘數十倍於此的捐款，則直到日本投降，也沒有發放過分文！某一機構爲向各醫院受傷難民發放救濟費，曾請求偽市府防空本部（部長是日人）派員指揮協助，偽市府的人要他們把捐款交去，「統一辦理」；該經手捐款者不願接受此項辦法，偽市府始允派員會同發放，但一再拖延，而且還要捐款者供給他汽車。據日本人談：東京等都市受空襲的災民，日本政府是免費發給食糧衣服的，但一次空襲以後，一星期也沒有救濟完畢，所以很多人都等候不到已凍死餓死了！法西斯統治者對其本國人民也好不到那裏，而殘忍腐敗的

程度，主子與走狗也如出一轍！

### 日本投降了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上海市民正處於極嚴重的鞭撻下，偽儲備券的購買力一天天急劇下降，黃金、股票，每天都漲停板（逐日漲起百分之十五），停板後的所謂場外交易，投機者早按照着下一天再漲停板的預測價格做買賣，其他物價當然無一不跟着飛漲。除從事投機買賣者之外，一般市民都吃不飽肚皮。普通中上級居民，極少能每日吃飯的，一般都是吃粥或麵，而且絕沒有把握能顧到十月以後怎樣過活。普通中上級職員的薪給津貼大抵爲偽幣十萬元左右，而米價則漲到八十萬至一百萬元一石，月薪收入不夠一個人的食米。要離開上海呢，火車輪船都擠得要命，等上三四天還買不到票。黑市不停加上幾十倍，更有許多人行李鈔票被騙被搶，弄得留不下，去不得。

九月九日蘇聯向日本宣戰了，這一消息震奮了所有中國人，而傲感的上海人則更爲興奮。因爲蘇聯紅軍的威力，在擊潰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已給上海人民以極深的印象。設備最簡陋的蘇聯俱樂部，每逢放映蘇聯戰爭影片，無論那一場都擠得滿坑滿谷；蘇聯的參戰，第一足以斷定日寇即將迅速失敗，第二足以粉碎日本軍閥憑藉大陸作戰的企圖。特別是第二點，從極殘酷的戰禍恐海中拯救了上海人民，所以說不出的高興。

十日同盟社突然廣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但只開了一個頭，沒有繼續下去。而美國舊金山的廣播則把日本要求保留天皇以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件等等，全部都說了出來，重慶中央社則大搖大擺各地熱烈慶祝勝利的消息。雖然上海民間的收音機都已割去短波，但秘密保留短波的還有不少，

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馬上傳遍全市。

日本在上海的陸海軍，態度向來是不一致的，虹口一帶所謂「海軍保甲區」，日本海軍當局充許居民慶祝，於是每一家都興高彩烈地懸掛國旗，燃放爆竹，而林逆植生所主持的偽中華日報投機出了一張『和平號外』，把同盟社和重慶中央社的廣播，拉雜刊載，市民搶着購讀。蘇州河以南的鬧市，馬路上也接着懸旗放爆竹，百十萬人民都擁到馬路上，跳着叫着，說不出形容不出的高興。特別是在南京路上，擠得人山人海，每一輛載着日人的汽車過去時，大家把瓜皮擲上去，平時威風凜凜的日本人抱着頭東躲西閃。特別是對着制服戴軍帽的日本人，群眾把他拖下車來，請他嚐一嚐八年來他們對中國人所價使的耳光滋味。有的則把軍帽拉下來在腳底下踐幾下。這樣，稍稍發洩一下八年來所鬱積的怨氣。平時兇狠如虎狼的日本軍人，在群眾的怒潮下嚇得哼也不敢哼一聲。

但日本陸軍並不同意把這一消息發表，日本在滬陸海軍及大使館事務所合組的『弘報局』通知各僞報：『下午九時有正式新聞發表；除此以外不許刊載一字。』到了九時，又通知要十一時發表；十一時又通知要十二時；十二時却說『不發表了』。於是十一日的各僞報上沒有一字記載，祇有僞秘書長羅逆君強發表了一篇勸告大家『鎮靜』的文章。

馬路上站滿了武裝的日軍，依然驕倨地鎮壓民眾，若干國旗都被敵軍扯下了。偽中華日報的總編輯楊逆迴浪，則因攔出『和平號外』而被日本憲兵隊捉去。其他因議論日本投降而被捕的也時有所聞。

### 三位一體

日本正式宣佈投降的一天（八月十五日），漢奸大頭子周佛海對僑中央儲備銀行的職員訓話，說：『中央已有命令下來，對本行職員一律保障；不僅安全有保障，職業也有保障。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爲什麼他敢這樣說呢？原來周逆佛海早在二三年前和顧祝同、戴笠相勾搭，進行『和平』活動，去年小磯內閣對蔣介石所提出的『議和』條件，就是經周逆佛海之手送到重慶去的。

日本投降消息一傳出，周逆就拍了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大意說：他將結合稅警團、保安隊和警察的一萬多實力，保持上海的完整，以奉給與『中央』；『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於主席之前！』據說：蔣介石接到這個電報後，非常高興，立即叫秘書覆電嘉獎。後來有人勸蔣直接答覆周逆，於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嘉獎』的覆電沒有直接給周逆而由蔣伯誠間接轉達的。

這位蔣伯誠『將軍』，國民黨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去年八月間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不久之後，即由周佛海的親信去保出來，日本憲兵隊怎樣會釋放他？那是不便深究的事。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就派他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滬代表』，就成立了『委員長代表公署』。

蔣伯誠『將軍』在上海是比較高級的『中央大員』，但他沒有公開做什麼事情。據說是因爲血壓高，不能見客，所以不願多管閒事。實際上並不如此簡單，他所見的是『貴客』，所辦的是『大事』。據消息靈通者說：『日本投降後，登部隊的參謀長兼上海陸軍部長川本少將會奉命拜訪蔣伯誠，提出下列建議：

爲切實執行中日合作，日本駐華陸軍可改編爲『剿共志願軍』，或改入中國籍，成爲中國『國軍』。



以協助中國政府剿共。」

蔣代表甚爲嘉許，立即發電向重慶報告並請示。據說重慶最高當局對此極爲注意。

在這一大事之外，蔣代表還做過一件小事。出版『國定教科書』的『中國聯合出版公司』，被『地下工作者』查對了，蔣代表大發雷霆，立即下令停付，由『中國聯合出版公司』自行清理。該公司在報上登了一則清理啓事，說：『本公司爲對抗敵僞文化侵略而設，現在抗戰勝利，本公司任務完成，即日停業清理。』包辦敵僞所編纂『國定教科書』的出版與發行的『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可以自稱爲『對抗敵僞文化侵略』。那南京的僞官僞將當然都是『對抗敵人政治侵略、軍事侵略、經濟侵略』的『功臣』了！

僞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僞江蘇省長任逆援道就任『南京先遣軍司令』的新聞發表了，民衆都莫明其妙，有一位老國民黨員打電報給蔣介石說：『任逆居然給以名義，聞之痛心！』後來知道有名義的不僅任逆一人，南北各地大漢奸，都奉到『新命』的。周逆佛海的新任命爲『軍事委員會別動隊上海行動總隊指揮』，是和任逆的任命同時得到的，因爲周逆比較調皮，他先去向日本軍部請示、解釋，獲得日本主子的諒解了，然後公開就職，所以周逆就任『行動總隊指揮』的新聞，比任逆遲了三五天。

報界敗類金逆雄白，是周逆佛海手下的紅人，一身兼金融、新聞、律師三界的領袖，不久之前，以八十條（八百兩）黃金購進一住宅。他對部屬說：『過去是混混的，老中央來後，我才真正兜得轉（有面子，有辦法）哩！』

## 「新太子派」

第一個在上海出現的「中央大員」是「軍委會宣導委員」何民魂（比蔣伯誠還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反共的老前輩，到淪陷區已有相當年月，據說他擔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後，在南京上海各成立辦公署，並設立各地區的地方工作委員會。所搜羅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員是王逆敏中（偽內次、教次、偽江蘇省財政廳長），戴逆英夫（偽教次、偽組織部副部長、偽上海市教育局長）等，江蘇省的負責人是金逆家鳳（偽中委兼華中運輸公司——日本的國策會社，偽華中振興會社的子公司——總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是王克修，偽市金庫復興銀行的祕書。據說王克修是蔣經國的人，參加蔣經國所領導的小組織的。因為蔣介石認為戴笠所負責的藍衣社，太偏於情報與行動，且聲名太壞，人家對它既怕且恨，不能擔當組織鬥爭與政治鬥爭的任務，所以叫蔣經國另起爐灶，組織「新太子派」，名叫「建國社」，作為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來，把羅逆君強吸收收進「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羅逆任董事長的「復興銀行」裏擔任「祕書」。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後，羅逆君強非常賣力，八月十日晚上發表「勸告上海市民」「鎮靜」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察局長」兼職，十六日以後，統率偽保安司令部及偽警察局在主要馬路上白天宣佈戒嚴，以便利日本軍隊日本機關搬運物資及藏匿、毀損物資。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區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時以後即禁止行人及車馬通行。要走路就必須向偽保安司令部領取通行證。因此，所有重慶派來或自稱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員，都取得了偽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證」。這和「投降」後的日本軍隊依然雄赳赳地高視闊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維持治

安」，有「異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後，羅逆及熊逆劍東等任副指揮，但總指揮部的實權則操於「秘書長」兼「軍法處長」程克祥之手，「總指揮部」設有「秘書長辦公廳」，其下分設各處，南京偽府的「部長」及偽上海市府的「局長」大都成了「秘書長辦公廳」的「參事」「參議」或「專員」，「少將」級的幾近百名。爲什麼有此不倫不類的機構呢？因爲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靠他保鏢。

日本投降後半個月內，上海盛傳蔣經國要到上海任警備司令或警察局長，所以羅逆君強非常安心。後來消息傳來，淞滬警備司令是錢大鈞，副司令爲李及蘭，而市警察局長則爲宣鐵吾，蔣經國派到了東北去。於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國報」及「小報」（改名爲「革新日報」及「上海晚報」）又被前線日報所接收。而羅逆君強也隨周逆佛海、丁逆默邨飛去重慶。

### 關於吳紹澐

從內地來到上海的國民黨「大員」，第一個是吳紹澐，他的頭銜之多，足以駭人：（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二）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部支團長，（三）國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員，（四）軍事委員會上海軍事特派員，後來又加上（五）上海市副市長，及（六）上海市社會局長，黨政軍民一手抓，聲勢之盛，氣餒之高，無以復加。除市黨部和三青团支團部以外，還設立了政治、軍事兩特派員公署，爪牙密佈，四出查封並接收寇產逆產。因爲他一身兼黨政要職，所以許多漢奸都鑽他的門路，貢獻贖物以取得諒解。據極不完全的估計，他在一個月以內，接收到一千

餘幢房屋（多數是洋房），八九百輛汽車，黃金在一萬條以上（廢放區的報上說是二三萬條，實在太低估了他，據說單是李士群的內弟葉羅先一人就送給他一千餘條），其他珠寶無算。日本「弘報部」（陸海軍及大東亞省聯合組成的宣傳機關，敵偽出版機關的宣傳紙的總給者）的存紙五萬餘令，也經錢芥棠拉攏，由日本大使館的福間領事送給了吳紹濬。（錢芥棠是晶報的老板，「八一三」戰役結束，即受日方津貼以晶報作側面宣傳，並供給敵人情報，一方面又與國民黨的患有真吳紹濬等互通聲氣。這次吳紹濬等取得了日本的紙張——雖然那本是應該交給中國的東西——據說對錢極為嘉許。）

因爲他權大勢盛而金條更多，所以引起別人的不滿。據傳錢大鈞在重慶曾對人說：「上海既有了吳紹濬，我也用不到了！」這句話傳到上海，吳紹濬一想不妥，馬上覆銜電連「錢市長迅速來滬」。

湯恩伯錢大鈞戴笠等相繼到滬之後，吳紹濬的氣燄較低，各方面都有對他不利的傳說（主要是爲了他撈得過多，太肥了），他放出空氣說：「上海市政府即將改組，市長將由朱家驊繼任。」因爲他是朱家驊一手提拔的，關係最切，絃外之音，就是「反正我吳紹濬在上海的勢力是不會倒的」。戴笠到了上海，拚命搜集吳紹濬的錯處，接二連三地向重慶報告，據說重慶來電召吳去，但吳握著不去，希望有人轉圜。到了十月底，他正坐着某漢奸送給他的保險汽車出外，在路上被人打了四槍，手槍子彈打在保險玻璃上當然毫無損傷，但吳不免有些吃驚。事後調查，證明是戴笠派人嚇他，他知道纏著不走是不行了，十一月三日始飛到重慶去。不久之後，副市長就換了前任工部局會辦的何德奎。據說在重慶會有人主張槍斃吳紹濬，「以肅官箴」，但後來有人爲他緩頰，說：「吳紹濬是中央所派到上

海去的第二個人員，如果說，與中央有關係。

另一說：吳紹澐的能夠回上海，其間最要緊的因果，委協的條件，是吳紹澐送了相等於幾萬條黃金價格的財產給張發奎。

軍事特派員公署的負責人是一號「長」胡文伯，據說他變的財產次於吳紹澐。胡文伯原來是吳開先的秘書，一九四一年被捕後即公署附過，任開道暢銷所謂「中央信託公司」要職，發了賣國財，在國際飯店與舞女小花狗（外號）結婚，極富麗豪華之生活，後因時機失敗，「小花狗」下獄求去，周孝伯逃債逃到屯溪，一年後又以「中央人員」的姿態回到了上海。因為他和奸官奸商都有一些「交情」，所以那裏有物資可搬，那處有油水可揩，什麼人可以騙，什麼人可以嚇，什麼地方可鑽，什麼房子可封，駕輕就熟，便利得很，所以一到就發了不少財。

社會部特派員陸京士接隨到了上海，因民衆團體都自由黨部派人整理，他無從控制，因此與吳紹澐暗鬥甚烈。陸京士和吳紹澐都是社月會的門生，但吳並不把社放在眼裏，陸還運用杜門諸關係反吳；同時因戴笠不滿意吳紹澐，陸與戴及賀衷寒素有連繫，戴委陸為「工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向偽警察局取得一些槍枝，成立總指揮部。由於吳陸兩人的爭奪「工運」領導，大家向失業工人騙取會費，而且還害了一部份工人去吃冤枉官司。

## 『忠救』與『美合作所』

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慶有第一批「盟軍」從溫州到了浦東，其中有美國顧問與美國教官，即將到滬。那一天早晨就有許多人聚在黃浦灘等候，準備好了爆仗、軍樂隊，還有插滿國旗裝着彩的

大下車，愛多亞路上斷絕交通達半日之久，結果是毫無影響，到下午二時許，大家無精打彩地走了。原來預定來上海的所謂國軍是『忠義救國軍』張阿六部隊（滬東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維持治安』的日本軍部却不答應，發出了命令禁止張部登陸。『交涉』無效，於是張阿六的聯絡參謀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們退回浦東。

過了幾天，『忠救』淞滬區指揮官阮清源（即袁亞承）率領了一群黑衣破舊、挾着蓆子的非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車數十輛進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設四個區指揮，其下又有支隊、大隊、中隊、小隊。其中有一個區副指揮是著名賭台老闆朱順林，他的作法是最直爽痛快的，有人去投効，先繳偽幣十萬元至五十萬元，就發一張身份證給他，可以出去『辦公事』，每一樁『公事』至少講偽幣五百萬元，最大的一樁，據說在十萬萬元以上。經手辦『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獎金，再根據所辦公事的肥瘠分派職位。所以祇要經手辦一樁起碼公事就可以一本數利。因此他門庭若市，手下有數千個大隊長。朱順林刮了不少錢，就購辦軍裝、被服、汽車、汽油等等報效給阮清源。

戴笠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對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義，總部即設在杜美路七十號杜月笙的新宅裏。『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裝部隊，臂章叫『定平』，逮捕漢奸等事，都由『軍統局』的特務指揮『定平』部隊執行，所以實權最大。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稽察處，完全由『軍統局』負責，總司令副總司令不僅不能過問稽察處做些什麼，甚至連稽察處有些什麼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為阮清源對戴笠的孝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來，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帶了手銬移送法院。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員的憤慨。因為阮清源是『忠救』元勳之一，他曾幾次率領部隊進入淪陷區，既會『抗』過『日』，更大大地『反』過『共』，對戴老闆是有過功績的。就說是

他到了上海後，敲竹槓，發橫財，也並非他一人如此，不願獨善他一個。而且退一百步說，他的罪惡無論如何比漢奸要低些，漢奸罪惡的尙且一犯也不提，大漢的漢奸雖提了一些，但到十一月截止，只有三十餘個不關重要的解決法外，面對既清源而敵黨如林！大家認爲最老練的手段未免太硬——特別是對自己的部下。

如果說是爲了做榜樣，所以對自己部屬要嚴吧！則陳恭澐（著『蘇衣社黑幕』，曾任偽寧「特工上海區長」）萬里浪（偽寧「特工浙江區長」）、「政治保衛局第一局局長」等叛徒都照常任用，既清源的罪終不至於超過陳恭澐、萬里浪等吧！

關於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潔」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號召集全體幹部訓話，門內門外停下了黑牌汽車四百餘輛之多。「軍統局」工作人員的每月薪金，沒有人超過法幣十萬元的，而普通都在二萬元以下。這幾個錢連黃包車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車？

### 『以毒攻毒』

上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會經過幾次破壞，特別是奚培文的叛變，把所有的團員都出賣了。奚培文是三青團上海支團部的書記，他拿上海全部團員的名冊向汪逆精衛的「特工總部」賣了廿萬塊錢，另外當然還得到一個漢奸官職。漢奸特工就根據了名冊，一一逮捕或勒索，一個普通團員，大概納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續費」「交際費」，特工們就說：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滬西「特工總部」捉到很多人（這些人當然變成「和平運動」的幹部）之外，還發了不少財，其收入數十倍於收買奚培文的價格。太平洋戰爭之後，三青團的總務部長運一箱文件單據到屯

滾去，晚上就破窗抄到了，於是又破獲了一次。從此以後，三青團在上海的組織，究竟有無，已成問題（沒有什麼活動，那是毫無疑問）。

日本一投降，三青團却是一個單位，除舊衙門「忠團長萬龍」，「擁護吳支團長」之類的標語，及印的黨報傳單之外，所最熱心的就是對房子、搬貨物、搬傢具。查該房屋最多的，在重慶來的機關單位之中，三青團考第一名。日本宣佈投降後的第三天，三青團在古城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僑軍官的房子，那位僑軍官是汪逆精衛的親戚，尺寸也不大，照理是毫無反抗餘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鑽了「地下工作者」，一個電話出去，僑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隊趕來保護，三青團有槍，僑保安隊的槍更多，於是僵持半天，三青團就耗完氣息費回去。上海最大的漢奸報，存紙最多的「中華日報」，也由三青團接收，改出「青年日報」。

三青團的份子，一部份是林逆柏生所領導的「青少年隊」等（其中一部份幹部本來是三青團去的，現在算是「復員」），還有一部份則是漢奸特工及日本憲兵隊密探等。他們都將身一變而為「地下工作者」。會有人問過三青團的負責人：為什麼敢拿這批人物？據答：通過他們才能知道漢奸的蹤跡與財產，此之謂「以毒攻毒」！

所謂「中央的正式部隊」，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憲兵司令部特派上海憲兵隊」。這個名稱既極特殊，組織更為特殊，因為到上海的祇是一個隊長叫做姜公美，其餘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漢奸、密探、販紅丸的、賣鴉片的、開賭會的、拐賣婦女的：一應俱全；而且全是這一些份子。當然，所做的工作，無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講斥責……，直到憲兵二十三團開到上海以後，姜公美的上海憲兵隊才結束。先是集中營中，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則在各方攻擊之下，



解送到南京去，但他的部下，則引起碼的人中毀了低價或高價元的金銀財寶。

據在美官員稱，他瞭解此下場，實有冤枉，因為他沒有說過別人的壞話，而別人則專說他的壞話，他早已做的好事都忘在他身上。這下又有三個人與他同之說。

的確，蔣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實執行當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漢奸，有錢即放；捉到共產黨，即可先殺後報，而且不要正式公文；第二、他曾收編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憲兵隊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黨國」，而爲了一些貪污勒索的小事（何況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懲辦他，怪不得他要不服了。

### 接收報館

「重慶份子」從「地下」一鑽出來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接收報館。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限制不遺餘力，但他們自己却深知言論出版的重要，在總的方面說，當然要控制一切，包辦一切，而內部各派則爭奪我奪，大家都想先下手爲強。所以對奪得最激烈的就是報館。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敵偽報紙，計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陸新報，在黃浦灘十七號英商字林西報館原址，爲日本陸海軍的機關報。（二）新申報，由大陸新報所經營，等於大陸新報的華文版，地址同上。（三）中華日報，南京偽府的正式機關報，直屬偽宣傳部，社長爲林道相生，代理社長爲許道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南京商會國貨商品陳列所。趙逆等擬委任偽宣傳部長，該報人專並無變動。（四）新中國報，在河南路原日本總領事館對面，董事長周逆傑，實際上由日方直接支持，與日本大使館關係最密切；另出一八期夜報，名曰小報。（五）平報，周逆傑等、歐逆邵壽、歐逆若強系的版

關報，地址在四馬路中市，於日本投降前半個月停刊。（六）國民新聞，係「特工總部」的邊關報，董事長也是周遊佛海，實際上為李逆士晉的工具，地址在瀋西靜安寺路，於日本投降前一個多月停刊。（七）申報，由日本海軍管理，社長陳道彬辭。（八）新聞報，也是日本海軍管理，社長為李逆思浩，副社長陳道日平，李逆的出任「新聞報社長」，且擔任「全國新聞協會會長」，據說會徵得蔣介石同意的。

關於這些報館的「接收」，頗有一些曲折，甚至有接連三四次的。除「平報」早和吳紹濬事前有接洽，即由吳紹濬接收，出版「正言報」，並無其他糾葛外，其他各報都或多或少地有波折：

「中華日報」先由三青團接收，改出「青年日報」，後來重慶中宣部認為偽中華日報是偽中央機關報，應由中央機關報接收，命令撥給「民國日報」，但青年日報推拖着不移交，而民國日報名義上的社長胡樸安是一位不善于與人爭奪的，所以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聞報印刷。

「國民新聞」先送給CC國的朱應鵬（「國民新聞」的「副社長」黃逆徽齋本CC出身），出版「光華日報」，後來又代印「中美日報」「時事新報」「大晚報」，但偽國民新聞為「特工」機關報，所以十一月中文由戴笠的軍統局接辦。

「新中國報」本來是預備送給第三戰區顧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務「中央調查統計局駐瀋專員」劉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吳紹濬系統的「地下總部」武裝接收，出版「正義報」；十七日被何民魂趕跑，改出「革新日報」；八天之後，又有顧祝同的「前線日報」奉命接收，而同時「文匯報」也奉「中宣部東南專員」馮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報的財產共同封起來，明天，馮有真的「中央日報」又來接收。於是中央日報為主，前線日報文匯報都擠在裏面。好

在每家都出幾千份報，一架搬運器印也來得及。

『大公報新報』和『新申報』大家都不去碰過，而前報日報又去碰過。但日本人在門口架着機關槍，沒有人敢去。最後始由湯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報』（日文版）。

『新開報』一度由戴笠部下的陳默接收，戴沒有同意，令陳默退還，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魯文濤到滬後，勒令停刊，聽候整理。『申報』自陳逆彬僞跑後，內部無改變，報面上大肆聲逆克祥（周逆佛海的秘書長），當然是傾向戴笠的，結果也勒令整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開報在程滄波指導、魯文濤經理之下復刊，申報在潘公展指導、陳訓志經理之下復刊，都成了CC的天下。

### 發了一筆大財

日本投降以後，大家所最關心的是『儲備票』怎麼辦。因為從一九四二年起，淪陷區的法幣已被敵偽強迫收去，以『二作一』換了偽幣，所有淪陷區的人民，都和偽幣有關係。偽幣的前途如何，成爲大家的切身問題。特別是大部份的偽幣分散在農民和小販手中，真正有錢的人，財產數千萬數萬萬數十萬萬數百萬萬的，則絕大多數已變成了物資，對偽幣如何處理，比率如何，都沒有問題的；大多數保有幾十萬幾百萬偽幣的人，則買不起物資，又必須藉此應付生活，則偽幣比率的大小，成爲嚴重的問題。

日本投降後，一般對偽幣處理方法的意見有下列幾種：（一）過去敵偽以『二作一』換成法幣，現在應以『一作二』換成法幣，使老百姓不吃虧。當然數目甚大，那應向日本索償；（二）照上海物價和重慶物價相差的倍數，即偽幣與法幣的購買力，規定比率；大體上是二十五比一，即偽幣二十五

元作法幣一元；(三)以爲價值銀行所有的黃金總額，照中央銀行財政部所定法幣與法幣，以收受僞幣。照這個總額計算，僞幣儲備行的發行額，據周道佛海官備是一萬九千萬萬元，照一般的最大估計是三萬八千萬萬元，則較周道佛所宣佈的加一倍；而僞幣儲備行的準備，僞黃金一項爲五十萬七千兩；以當時重慶的官價每兩十七萬元計，值法幣八百六十一萬九千萬元，則每四十元僞幣合法幣一元。後來重慶的黃金官價，從每兩十七萬元減爲每兩八萬九千元，收進價八萬五千元。如照舊出價計算，僞儲備銀行的黃金價值四百五十一萬三千三百萬元；照收進價計算，爲法幣四百三十萬零九千五百萬元。照前者計算，每法幣一元可以收回僞幣八十四元，照後者計算，則每法幣一元可以收回僞幣八十八元。

當然，照第一種算法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最限度應該照第三種標準折合，因爲這對國民黨是毫無損失的。雖然照那樣計算，淪陷區的老百姓已吃虧很大，過去的法幣被敵僞以「二作一」取去，換成了僞幣，現在又要以數十倍之多的僞幣換回法幣。

然而國民黨當局所定的比率，却是二作一。「財政部長」徐堪發表談話，還說：政府願意人民，不使人民遭受損失。事實上單是接收到黃金，只要省去百分之四十，就足以收回全部僞幣了。價值是這一回事，國民黨政府，就賺到黃金三十萬兩，合法幣二百七十萬萬元。

另外，更有一個奇怪的辦法，就是僞幣整理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建議，應防止因僞幣收受而更加造成通貨膨脹，所以應將大宗僞幣凍結。然而「財政金融特務員」陳德憲（行）的辦法，則命令各銀行錢莊自行清理僞幣存欠。這樣一來，把所有的僞幣全部趕上了市場，於是競相購買物資，互相拋出僞幣，造成物價空前高漲的速度。這當然談不到，而每一張僞幣也都要以法幣換回來。

總之，一句話，老百姓倒苦，國民黨政府又發一筆橫財。

### 湯恩伯與錢大鈞

對於接收上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同時他又是『軍委會東南行轅主任』，節制七、九、十戰區）會事先有過詳細佈置，派了很多人在上海，與敵人及漢奸都有長久的連絡。日本一宣佈投降，他即電周逆佛海轉告岡村寧次，要他派員向顧接洽投降。而在上海一地，三戰區的機關計有聯絡處、辦事處、聯絡委員會、宣導組、先遣警衛隊、及某某連絡站等，總計達十餘單位。在顧祝同的心目中，南京、上海一定是由他接收的。不料後來重慶的命令發表，京滬由『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受降』接收，使顧祝同大失所望。

爲什麼會有這樣變動呢？據說是何應欽玩的花樣，他認爲顧祝同在京滬一帶早有部署，如由他『受降』接收，就一切抓在他手裏，何應欽就沒有權利了。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蔣也認爲顧祝同是江蘇人，且久在江蘇，如接收京滬，將形成一雄厚的地方勢力，所以改派了與京滬江蘇沒有地方關係的湯恩伯。

湯恩伯到上海的一天，蘇商時代日報正連續轉載蘇聯雜誌關於檢討中國抗戰軍事的文章，那一天剛剛登載一九四四年河南戰役湯將軍命令他的士兵爲他搬運工廠及商品的情形，使人回憶起河南群眾中所流傳的『河南四荒，水旱蝗湯！』

到滬『受降』的湯恩伯，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

湯在華懋公寓接見日本登部隊（第十三軍團）司令官松井中將，湯開口說：『對不起，今天要聽到

這裏來說……」坐在旁邊的美國顧問一聽之後，立即警告他說：「將軍！你要顧到你的地位，你是戰勝者，對於投降的人沒有什麼『對不起』，你應該說『我命令你』……」這樣，才重新用命令口吻發言。據說後來湯恩伯與松井單獨會見的時候，曾說：「早知如是，我們應該預先演習一下。」

湯恩伯的所以被派到上海——全國最重要最富庶的收復區——來，主要因為他對蔣的服從心較強，他的政治野心較小，容易控制。因此，他到上海後相當謹慎，深怕特務去蔣前觸他的壁腳。

錢大鈞過去曾任淞滬警備司令，給上海人的印象是胡塗庸碌，這大概就是他被派到上海來的主要原因。錢大鈞還兼任淞滬警備總司令，一身兼軍政重任。實際上市政府的各局長都各有奧援與社會地位，非市長所能指揮，而市府本身的實權操在祕書長沈士華之手，淞滬警備總司令部則完全由副總司令李及蘭主持，錢大鈞完全不加過問。

那末錢大鈞做些什麼呢？唯一的工作就是招待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他的日常工作，是舉行鷄尾酒會，招待嘉賓。因此上海的中下級人，說他是『鹹水妹』的兒子，看到外國人都是他的爸爸！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中，重慶來的官吏和原來留在上海的人員而復員的（沒有參加偽組織的）差別，是很大的。重慶來的（以下簡稱『重慶人』）薪給為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以下簡稱『上海人』）為底薪的六十倍；米貼呢，重慶來的為法幣一萬六千元，留在上海的為法幣四千元。機關中開飯時，『重慶人』的桌子上有六個菜到八個菜，『上海人』的桌子上只有四個菜。『重慶人』和『上海人』，分成兩個世界。而工作效率上『重慶人』的工作既差，貪污方法尤其笨拙而顯明；因此一般『上海人』都瞧不起『重慶人』。

## 接收敵產與逮捕漢奸

『受降』接收人員以及自命接收人員一到上海，當然都搶着接收敵偽財產和查封漢奸財產，搶得愈多愈好。但因蔣介石所任命的『受降長官』遲遲發表，給日本人以藏匿、損壞、移轉變賣的機會。湯恩伯到上海後，成立了兩個接收委員會：軍用品接收委員會以三方面軍副司令官張雪中爲主委，非軍用品接收委員會以市政府秘書長沈士華爲主委，統一接收敵偽財產。另外則財政金融、產業、交通、電信等都由財政、經濟、交通部派員，受三方面軍的統一領導。但除敵人軍事有關者外，其他敵偽財產已均被先來者接收過一次或幾次，而大部份的機器零件以及價值高貴的東西，多數被接收到接收人員的私囊中去。

所以國民黨一接收之後，上海的失業工人增加了幾十萬。其他貪污舞弊的故事，流傳甚多，數說不盡。

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上海來，命令各接收機關分別報告經過情形，及接收物品的細目。宋子文一回重慶，即發表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敵偽產業處理委員會及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統一管理敵產，這個委員會的秘書長及上海處理局局長由劉政芸一人兼任。這一位置其重要與肥饒或超過任何部長吧，但劉政芸是怎樣一個人，上海人都非常生疏。劉政芸是重慶金融界新起的紅人，美國留學生，曾在郵政儲金匯業局儲蓄處工作，受知於徐柏園，前年重慶發動『國民儲蓄運動』時，他即任聯合儲金處處長，他擬了一些計劃，深得蔣的賞識，從此一帆風順，歷任中國農民銀行副經理及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雙十節他也得到『勝利勳章』。

至於軍用品的接收，據張雲中報告：共計繳到日本的槍支六萬左右，但上海地區的日軍陸軍，大家知道有二十餘萬，如果包括在鄉軍人及民警團（都有槍的）等處有三十萬人，爲什麼就有這一些槍呢？那是一個無從查問的祕密。當然日本人會毀壞了一部份，但決不會相差如此之巨。

漢奸們自日本投降後，一向逍遙法外，直到九月廿七日才開始逮捕。當時大家拍手稱慶，說：『那現在真天亮了！』但發表名單祇有三天，三天以後，就不再發表了。原來這中間是另有機密交代，國民黨本來不願意逮捕漢奸的，但外受英美的壓迫，內受人民的督促，所以不能不提。事前美國人會說：南京僑府會向英美宣戰，如果國民黨不加逮捕，則盟國將提出戰爭罪犯的名單。因此國民黨覺得不能完全庇護，祇好擇要逮捕，而公佈名單，以示已懲辦。但是公佈名單後，就不能上下其手，所以三天後即不再公佈。逮捕的漢奸，據說是有定價的：小漢奸自法幣三十萬元起，大漢奸則爲黃金萬兩。上海流行一句話：『不怕犯天大的罪惡，只要有等身的黃金。』

聽說有一個『維新政府』時代的『立法委員』，去向逮捕漢奸機關自首（因爲他是偽職『簡任』，依法應逮捕的），但得到的回答是：『你覺得連飯都吃不飽，誰要捉你！』所以有了錢，不是漢奸也會有人找到你頭上，沒有錢則真正做漢奸的人也沒有人會捉。

### 偽官可用，偽學生要罰。

錢大鈞的市政府成立後，對於留在淪陷區而沒有落水的舊市府職員的復任問題，甄別審查極爲嚴格，而且錄用時大都降級，待遇更與重慶來的大相懸殊。然而對於偽市政府的大小職員則繼續任用的不少，因爲重慶來的官吏和南京系統的偽市府各機關，是辦理移交手續的，和前後任辦理交卸接印的



關係毫無差別。因此，有許多職員大部留用，『以雲君手』！

特別是財政局，爲了徵收的便利，竟其次批留用的員。市政府爲了徵收營業稅及修路（修路及娛樂捐），由財政局召集各業商人開會，財政局出席說明稅率及徵收手續的一位副科長，上海商人對他很熟悉，原來他就是羅道君強任偽財政局長時代的偽科長，有許多商人感到莫明其妙：過去漢奸時代是他收稅，現在『中央』來了，爲什麼仍是他來向我徵收捐稅？

上海市的屠宰稅第一第二徵收所主任黃某和周某，就是過去漢奸時代的偽屠宰稅徵收所副主任，一個是偽鮮肉業公會的『理事長』，一個是偽公會的『秘書長』，平時想出許多方法來剝削肉商，獻媚敵僞，肉商對他們極爲憤恨，現在看見他們仍高高懸在鮮肉商人的頭上，大爲不滿，就刊登廣告，痛斥其過去的行爲，要求撤換。第二天，黃某周某也刊登廣告反駁，說他們的參加偽組織，是自有其管機關查，無庸問任何人聲辯。大約想出各種方法來剝削老百姓，就是他們的『地下工作』！

國民黨對僞官如此器重，可是另一方面對學生却極爲嚴厲。上海的國立學校，如交通大學和上海醫學院，雖然已內遷，但大部儀器都留在上海，沒有能搬遷。僞府成立後，不斷企圖擄取這批儀器，因此就開始復校了，當然這些學校成了漢奸系統下的學校。但據一般的見解，這些學校的功課比較良好，比較遷移後方的學校來要強一些，因爲上海的原有科學設備較全，教學比較上也較認真。至於僞化思想問題，在上海各一學中，除趙道正平的偽上海大學，和裴逆復恆的偽上海商學院外，比較微進，然而日本投降以後，各學校一律停課，兩個月以後，沒有開學消息，學生們四出呼籲，要求給予繼續求學的機會。到十月下半月，國民黨宣佈了甄別辦法，要各大學入『大學補修班』半年至二

年，然後再調級。而且，抽出一門門的具體意思與教育，顯然是一所變相的法西斯集中營。所以學生都不願意。十一月和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到上海視察，學生向他請願，他就召集學生訓話：「誰叫你們不到後方去的！你們要享福，不要在上海，要偽教育，那你們就應該吃苦！叫你們停學一年或二年，那是最客氣的了，你們要知道：這是你們應該交與的懲戒！」

上海學生們給他的回答是一學生無稽。偽官可用，偽學生反前一定要懲戒，難道學生有什麼罪惡，而且其罪惡還超過漢奸官吏嗎？這樣的措詞，連最接近國民黨的實際代言人的大公報也於十一月初曾發表了一篇社論，要求當局重視青年，不要把青年都趕跑了。

然而國民黨的方針，並不是追究青年學生的偽化不偽化，而是要青年學生全部法西斯化；你看：偽青少年隊的幹部是不是有許多已變成了「三青團」的幹部嗎？

附

錄

三

## CC派官僚資本

徐方略

### 經濟

國民黨內CC法西兩派的領袖及上層幹部，在經濟上方是官僚資本的一派，而且是急速擴張的後反動的一派。

### 村經濟

這派官僚資本主要是以二七七一四一二三血戰事變的後一個月（五月），在親法西斯巨魁何應欽的電令下，CC份子辦了一個江蘇省農民銀行，該派重要幹部趙標華就是這個銀行的總經理。這是CC派官僚資本的起源。在反動派大規模進政解放地區的時候，一九三三年四月，由鄂豫皖贛四省「匪」司令部の特許，將漢口行營的「農村經濟救濟處」擴充為四省農民銀行，不久發展為全國性的中國農民銀行。這一更大的搜括農村的銀行，一開始就主要的握在CC派及部份復興份子之手。孔祥熙財團部份插足該行，前一兩年度會取得最高權力（如孔祥熙兼該行董事長），但去年復為CC派奪回。目前該行董事長就是CC首領之一陳立夫。農行掌握了「農貸」和一般農業金融，輔導「合作」事業，及土地金融的獨佔權利。在內戰時期，CC份子曾倡導他所用的「合作社」，亦在贛、浙、川三省成立省合作金庫（即合作銀行）。抗戰後他們更排擠了一部份資產階級的農村合作事業，而一手把斷了。從一九四一年起CC派更進一步的籌設中央合作金庫，由於大官僚資本間各派的鬥爭，特別是由於前年國民黨在豫、湘、桂、黔之役的潰敗，曾一時的停頓，最近他們又積極的準備擴張，確定資本為六千萬元，半數由國庫撥支，農行出資三分之一，國民黨區各合作社及省聯合合作金庫也被分派了六分之一。由中央金庫的董事長亦為陳立夫。

而CC派重要幹部谷正綱，盧建華，蔣慶生，張布雲咸任重職。從而全國近五百的省縣合廳，將成爲CC中央金庫的子公司，更擴張了CC的金融體系，農行和「合作」的金融力量CC官僚資本第一個部份。

### ● 僱入文

### ● 化部門

其第二個主要部份爲文化，「出現的企業。CC派擁有三十個左右的「中央日報」，「民國日報」又兼管了許多別的報紙，如立報，正言報，辦了許多書店和出版托辣斯（如中國文化服務社，正中局等）。他們並會籌辦一個文化銀行，但也因一九四四年的敗仗而未實現。最近他們又辦了一個中國農業電影公司。CC派歷斷新聞出版的企業，不僅作爲增殖官、財產的工具，而且作爲統治思想的格殺民主運動的有力工具。

CC官僚資本的第三個部份乃是農工礦商及其他銀行事業。這一方面他們急速的在發展着。在農行的投資之下，有很多農業公司，如中國糧食公司，此外，許多農場及墾殖公司等皆爲CC的系統，如華西墾殖公司即以二陳爲大股東。CC插足的其他工商業尚有六公鐵廠，大中華煤運公司，華華綢緞公司，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等。一九四四年，陳立夫會與四川鹽商開了中國工礦銀行，雖在輿論不滿之下，不得不辭去董事長職務，但實際上陳仍是老闆之一。交通銀行，這一個被「特許發展全國工礦事業」的銀行，也一部份的爲CC派所掌握，該行現任總經理就是趙隸華。

以上就是CC派官僚資本全貌及勢力分野。

### 以掠奪和

### 侵佔起家

C C 派官僚資本，在大官僚，大買辦集團中帶有最濃厚的法西斯性的和超經濟的官僚與大地主的剝削性。其第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以掠奪和侵佔起家的。這個集團本身在開始時沒有任何資本，十多年來他們專憑把持、操縱「政府機關」所辦的公司、銀行、農場、爭奪地盤、安插幹部，以創立其家當。因之，他們拚命網羅爪牙，擴張力量。C C 派主要幹部徐××從事結納電業人員，葉秀峰結納工礦人員，羅家倫張羅西北，並打入新疆，同時C C 派並成立了許多網羅的機構。凡此，證明了C C 派從事經濟事業的手段，純粹憑藉所謂「國家資本」的剽奪及其派系的擴張。這種超經濟的掠奪手段，正是法西斯官僚資本的特色，也正是戈培爾之流的衣鉢。

### 以封建地

### 主為基礎

C C 派官僚資本的第二個特點，是以封建地主為基礎，以「合作」為名殘酷剝削農民。「農貸」就是C C 派勾結地主豪紳剝削農民主要手段之一。它通過地主豪紳所把持的「合作社」，在實際上變成地主豪紳的高利貸，及其他榨取（如囤穀囤糧」的本錢，而農民銀行却由此獲得月息一分八（一九四四年數字）的重利。另一個向農民榨取的重要手段是「土地金融」包括「土地債券」，以扶植自耕農購地為名義的貸款及幫助C C 派操縱的「土地機關」徵地的貸款。但其實際，他在「扶植自耕農」的模範實驗區北碚，C C 派所倡導的這一政策，却幫助了大地主土地的兼併，大地主盧某就是執行這一政策的局長，憑藉着政治的權利，趁機以低價收買農民土地，迫使農民流徙他鄉（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九日重慶「益世報」載農民王祥安抗議的故事）。在福建仙岩，根據該縣關於扶助自耕農的公報沒有土地農民在新的政策下獲得了土地，而在C C 的政策下，重新失却田畝。大地主憑藉了「地債券」在

經過土地革命的地區進行復辟，重建起他們的剝削秩序。

C C 派的頭子們，爲了鞏固他們與地主豪紳的勾結使後者成爲其獨裁統治的主要社會基礎，提出了「到農村去」的口號。曾經附敵而「脫離」歸來的 C C 漢奸吳開先在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中央週刊」上寫道：「關於經濟方面的事，主要的就是農村合作事業」，「黨必須領導農會來主辦這一件大事」，「不用說，辦這件大事非但要有錢，而且還要錢——不少的錢」，「因此黨應當幫助農會與當地金融機關，尤其是農民銀行，建立事業上的聯繫，通力合作，利用金融機關的經濟與技術，有計劃的有步驟的進行各項農業合作」。並強調的：「尤其如合作社等，黨必須而且應當簡拔當地公正熱心的農民或農民知識青年主持其事，並吸收收入黨，黨則處於領導地位與輔助地位。」事實證明了 C C 派對國民黨區合作社，農會，農業合作機關的「領導」，就是獨裁和壟斷。而所謂「公正熱心的農民或知識青年」正是地主豪紳及這一階層的子弟，而中農、貧農甚至進入合作社的資格都沒有。這套法西斯辦法，使 C C 黨棍，特務與地主豪紳在「合作」事業中結爲一體，就強化了農村封建制度，把農民除在脚下。

### 法西斯式

### 的擴張

C C 派官僚資本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它帶着急速擴張——即法西斯的猛烈的掠奪——的特色。這不僅可以從前述 C C 派實際活動上看來，而且更可以從他們的經濟綱領中看出來。自然，在世界和中國的民主運動高漲的現勢下，他們不敢公開提出他們的綱領，但是他們却千方百計的在各種保護色下提出這種口號。主要代表作之一是陳立夫的「義務勞力制度」（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央週刊），它打出實現孫

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的幌子，賣着納粹的狗肉，主張着國民經濟的全面的官僚資本化，凡「大規

模的基本工業（按：這樣就包括了切重要的輕、重工業）、機器生產、航運、港埠事業、應由中央經營而國有之」。

CC派口中的「國有」與孫中山先生的「國有」主張絕對相反，孫先生曾指出：若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則所謂「國有」「其實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事實上，CC派的「國有一企業」是他們竊國家財產為私產，格殺民營企業和生產力發展的兇手。此外，陳立夫還提出了一縣地方興辦山林川澤之利，與夫衣食印刷等輕工業及建築住宅、道路、水力諸端均可由地方政府經營，而全縣人民所公有」。他們的「地方經營」是在這樣條件下取得的：（一）地在「中央」投資之下，以每年收入「供獻」百分之十至五十於「中央」；（二）「中央」「供給」機器，並「掌握」「統治」其「大量物資」；（三）「中央」掌握了分配人力組織與生產指導人員的權力，並設立「負責統籌全局之計劃機關」與「十分健全之專管與執行機構」，以統制地方事業，這樣，地方成為「中央」的經濟附庸，即地方官僚資本隸屬於「中央」大官僚資本系統之下。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人民公有」實際上是少數官僚私有的代名詞。這一官僚資本的系統按照陳立夫的主張，不僅包括了工、農業，而且包括金融事業，他說「吾人必須設法做到縣金融機關為勞動力生產之樞軸，中央機關為機器生產之樞軸」。這就是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個大官僚資本——金融獨佔寡頭的體系。CC派的完整體系的全盤官僚資本化的主張，與德意法西斯路線並無二致。

特別殘酷的乃是他們這個制度建立在對所謂「義務勞力」的剝削的基礎之上。其口號是「人力創造機器，機器創造物資，其辦法則是：「其人口在二十萬以上者，姑以千縣計，每年徵用五萬人，一個月的義務勞力，以建設地方」。十分明白的，這乃是中世紀的超經濟的剝削勞動的方法，也正



是純粹的義務勞動的制度」。其目的則如陳立夫所自道的是爲了卅至一百五十萬萬元的「地方」「供獻」。

如CC派在政治上的制度一樣，他們還主張着在經濟上實行特務制度。如「民意」第一四五期所提出的，他們要實行經濟警察制，以「直接維持經濟秩序，限制個人集中」；並主張「統制之區域很普遍；統制之方法尤貴嚴密」，對於違反者之處置「亦須嚴厲」。他們企圖以特務恐懼的手段來限制個人的貿易和企業的自由。來鞏固和擴張他們法西斯官僚資本劫取人民脂膏血汗的「秩序」。

CC派的這種法西斯綱領，在抗戰中已部份的實現了。張厲生所主持的總動員會議，對於物價的統制，殘酷地打擊了中小工業家和中小商人；對工資的限價與統制殘酷的打擊了勞動者，而經濟警察更加危害了自由企業者各階層人民。

總括起來，CC派的首腦們是最反動的封建法西斯——大地主大官僚資本集團。他們主要的是農民的吸血者，並急速的擴張，從「農業金融」「合作」事業向全國經濟事業伸展，掠奪。目前他們拚命叫囂着「反對官僚資本」，但其實質，乃是爲了窒死一切私營的自由經濟，並排斥國民黨內派別的官僚資本，完全是爲實現其法西斯綱領。他們的理論和實際，一方面鞏固並發展農村的剝削，更鞏固的束縛了農民，另一方面摧毀了自由資本和生產力的發展。因之，這一集團在經濟上，乃是中國民族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兇惡敵人之一。

（按：本文約作于一九四六年春。）

## 論「國營」與其他

以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爲例，此公司經營設備。機器、廠房，以及種種設備，是接收得來的敵偽產業。原料——棉花，來自美國。零件機器來自原料廠？因利乘便，動用平準基金。機器原料，一切一切，都是便宜貨，以這樣的一國營「事業」，來和民營企業作競爭。你說，民營工廠，除了關門大吉之外，尙有何路可走？

該公司資金，據說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官股，還有百分之四十是商股。可是一看賬簿，這百分之四十的商股，却原來是中國銀行。試問，在今日之天下，一個普通老百姓，能有機會做中國銀行的股東和董事嗎？再如：重慶數大工廠，聽到後因工人要求發給遣散費，而發生工潮。政府（指國民黨政府）派員前往調解，說工人的要求，甚爲合理。可是廠方發不出這麼多遣散費，乃不得不宣告破產。民營破產，於是就來了官方「整理」。在「整理」過程中，官員們獲得股權。不久，他們又說此刻無需「國營」了，還是商辦罷。好在，平地一聲雷，股票早已掌握在這般「亦官亦商」的大人物手裏了。

對民間工廠如此，對民間報館或其他文化機關亦如此。不信，請看今日之申、新兩報，股權早已在整理過程中（六個月），老婆雞變鴨。新聞專業黨營，可是在表面上仍裝作「民間報」恣態，妙就妙在這種地方！

這裏，我又記起一則新聞界趣聞。勝利前夕，重慶「世界日報」，曾在成舍我雙手奉獻之下，變

成了「黨營報紙」。雜誌發表後，自然引起《新報》中英較，有一次疑筆爲文，撰著社論，得意忘形中，大書「本黨」如何，一本黨「如何」。其詞先生看懶得去校正，所以第二天報上的社論中，赫然刊載「本黨」字樣，造成一件大笑話。因爲《新報》「黨」性十足，但對外仍稱爲「無黨無派」的民間報」也。更正儘管更正，事實還未改變。（據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消息」何林作「論國營及其他」）

## 宋匪財富掠奪的驚人事實

蔣區天津『新星報』十一月十九日所載『宋子文有多少財產？』一文，可以看出宋匪財富掠奪的驚人事實：

民國二十一年孔祥熙取得蔣匪中央銀行總裁的地位（按宋係中央銀行第一任總裁），宋子文即竊取中國銀行董事長，三十三年一月，孔祥熙又奪去了宋子文的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地位，但是事實上中國銀行還是在宋系把持着，因為宋在該行握有大量『商股』。宋子文除在這個所謂『國家銀行』建立了金融據點以外，在新華銀行，廣東省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和上海銀行，都握有大量的股票。在這七家銀行中其中廣東省銀行幾乎完全是『宋家』的。中國國貨銀行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兩家的銀行，因此這兩家銀行在抗戰時期就能有替蔣匪『政府』買賣黃金的權利。

在商業方面：宋匪更有大規模全國性的活動，民國二十五年宋子文組織中國棉業公司，自任董事長；二十六年四月間成立獨家經營洋米入口的華南米業公司，又自任董事長，同年同月成立的國貨聯合營公司——是壟斷全國國貨——從新式工業、手工業、一直到土產買賣；在香港，宋子文在廣東省銀行樓上設立了中國物產公司，操縱各種物資的貿易。抗戰時，宋子文又攫取重慶的中國國貨公司，四川畜產公司及西寧興業公司的大量股票，戰後回到上海來又成立了孚中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山貿易公司，和利泰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是由宋子良出面的，在紐約華爾街設有分公司，這十二個公司，壟斷了全國的米、棉國產和進出口貿易。

在工業方面：宋匪擁有二十二家大工廠，控制了紡織，煙草和糖業；宋子文除透過中國銀行，把持了鄭州的豫豐紗廠、濟南仁豐紗廠、昆明雲南紗廠、青島中紡公司、咸安紡織公司和甘肅興業公司之外，又透過了中國棉業公司租盤了上海恒豐中國紡織新局。直接投資的有揚子電氣公司、淮南鐵路公司、漢口濟水電氣公司、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協和製藥廠及中國毛紡織廠。戰後，又以其政治地位控制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同時又透過資源委員會去控制華北八大公司——冀北電力公司、華北鋼鐵公司、華北水泥公司、天津機器廠、天津製車廠、天津造紙廠及中央電工器材廠天津分廠。至于礦業方面，宋匪在湖南湘潭一帶，已買好幾座礦山，準備大量開採錫砂。

運輸業方面：在抗戰時期，宋子文、宋子良成立了西南運輸公司。這個公司是蔣匪「交通部公路總局」以外的第一個私營的運輸公司，在滇緬路暢通時，這個公司又改爲「西南運輸處」，它把持了當時唯一的「國際」運輸；招商局也爲宋匪所直接支配。

宋匪極大部份財產是存放在美國的，但僅就上面不完全的材料看來，就已大得無法估計了。現在，宋匪又竊取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地位，並在美帝國主義的指使下開始在華南作新的掠奪了。

## 中國法西斯特務的血腥罪行

薛 燕

中國法西斯特務的血腥罪行，僅以抗戰期間而論，它們不但暗殺了無數共產黨員（包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宣俠父等），同時暗殺了無數愛國青年與老百姓。一個署名青島的青年控訴一九四二年特務機關在河南聯合組織的「伏牛山區工作團」殘酷的罪行稱：「我們時時聽到在魯山、南召一帶，有成百的青年和老百姓，男女老少都被集體活埋！並已有不少學生被分批送到洛陽西安的集中營裏去，「工作團」像是一陣恐怖的可以斃滅世界的毒風，從一個縣份掠到另一個縣份。」（「中國通報」十期）另據米波的貴州通訊中，追述抗戰初期貴陽的情況稱：「學聯事件、民先事件、被捕的人在「圍剿」新四軍成功後，好多在保安處後操場被槍決了。接着大批的逮捕，連初中一年的學生也不免，私刑、暗殺、逼供，雲南會館裏關着幾百「政治」犯和「思想」犯，已是公開的秘密。」（「民主生活」第五期）在西安一直到現在還是：「各學校失蹤的學生，更見加多，城壕裏，防空洞裏，或學校的附近，不時發現遍體鱗傷的青年屍骸。」（「民主週刊」第七期西安通訊）像這種難以數計的血案，每個地區都經常發生。

爲了蓋禁這些被綁架來的人們，「軍統局」和「中統局」設置了許多秘密監獄，僅在公開書報中透露出來的地址就有重慶磁器口松林坡，望龍門和山東師範地下室；西安太極廟門街至壽春十三號，柏樹林公字一號，後宰門四號和城南慈南山；蘭州新關一八六號；麗縣的藥王廟；以及貴州息烽，江西上饒等地。其實是每個主要的特務機關都有自己的秘密監禁處所。在這些秘密監獄裏，特務

們用世界上最殘忍的刑罰，加在每個被捕者的身上。一個會在「軍統局」西安「西北特種拘留所」裏身受各種毒刑的青年趙國光控訴稱：「刑罰有「坐飛機」、「壓槓子」、「上電刑」、「下竹籤、鉗指甲、灌辣子、砸破骨拐、懸樑上吊、烙刑、火刑等。每天刑具聲伴隨着受刑人的慘叫聲使人不忍聽聞。我在「坐飛機」時墊了八塊磚，以致小腿腫得比大腿還粗，褲腿全爲鮮血染紅，後又使用烙刑，以致全身腐爛，臭氣難聞。我因爲再難以忍受下去，曾數次請求快些槍斃。然而終不得痛快一點死去，至今遍體鱗傷，歷歷可見。尤有甚者，就是暴徒們將女犯們拖出去，任意蹂躪，較之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經過此監獄的人，雖幸得苟存，但也會變爲殘廢了。」

另一青年追述他在秘密監獄裏受酷刑的情形稱：「上衣服被剝去了，被推坐在那寬凳上，兩腿平伸，上面用繩索縛好，兩隻手也被繫起來分別拉在那兩人手裡，在他第二次問我而我仍只得回答他「不知道」後，皮鞭開始抽在我身上，我沒有慘叫痛哭，忍不住疼痛的時候，我昏過去了……幾分鐘後，我仍然睡在凳上，醒來渾身水濕，身上疼痛得更厲害。我想馬上死去，但是我不能死。……連續着審問抽打，用兩排尖尖的步槍子彈在我胸部的前後用力壓進，在我腳跟下面墊上磚塊（大腿被綁貼在凳上的）幸運的沒有被倒灌辣椒水，沒有挨打橡皮棒（這種罰法在腦部敲打不疼，但可以摧毀神經系，最慘酷）和受火刑。當我被帶出去的時候，兩腿酸軟不能立，被架着又拋進小屋裏去了。……第三天當我第二次被捉去的時候，在一個臨時充作候審室的小屋裏，我發現那兩位同學，他們已受了最慘毒的火刑，一個同伴的背和屁股已被烙成爛肉醬，沒法穿上褲子，他流着眼淚伏在屋角的床上，寒冷的天氣和疼痛，使他時時戰抖，這樣他還被迫寫「自傳」。」「中國週報」千期）

在這種殘忍到極點的酷刑之下，即使不被槍斃，活埋，也會被拷打死。億倖不死的就被關在集中

營。上述同一青年對此述稱：『在各地的集中營裏，半數以上的「囚犯」都是從各地受了酷刑仍不「自招」而被押送來受訓的最熱情最純潔的愛國青年學生。都被囚禁在集中營裏的，除了被殘酷的「勞動」和非刑虐殺死去者外，能够出來的，就只有那些神經失常的可憐的病衰的青年了。』（同上）這種集中營和變相集中營是很多的，『如像上饒專關新四軍官兵的集中營，西安的「勞動服務營」，太和的「青年留訓所」，巴縣、崇安、恩施、臨泉、老河口、衡陽、陝壩、榆林、貴陽、立煌等地的「戰時青年訓練團」，以及其他各地各種名稱的集中營和變相集中營』（北平「集納」半月刊第一期）。如最近北平籌設之「青年轉業訓練班」，即為變相集中營之一。

這些集中營裡殘害的青年是無數的。據「民主週刊」七期所載西安通訊中敘述西安「勞動營」的情形稱：『「勞動營」在西北，不說被抓的人害怕，就是平常人一聽到「勞動營」三字都會心驚肉跳，因為這是可怕的牢獄，只一批一批，一隊一隊的抓進去，就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了。人們每從西安西關外經過時，看見那高大的圍牆，上邊站滿了有槍的衛兵，幾十步外，就喝令你停止，不許走近，那戒備森嚴詭密的情形，令人真是毛骨悚然。抗戰八年中，西北的青年以「思想犯」而抓入勞動營的不下數萬。』另據「集納」一期載一個曾被關在江西上饒集中營，署名任光的對該營罪惡控訴稱：『營內囚糧既少又壞，吃不飽也下不了口，黃泥沙子不說，還夾雜着畜類的糞便，所以政治犯也多患病，病了就聽其自然毫無醫療設備，曾任北大教授張實先生就是病死在營內的。這種病死的人很多，尤其是夏天，每天都有病死的，……屍骨就丟在野外，熱天也最多不過淺埋一下，歸根是被野獸吃去了。政治犯的生活，大部份時間是做苦工，不管烈日驕陽，狂風大雨或地凍天寒，都要做苦工，累死了也不管。……關到營裏以後，無法定程序的審問，不是從不審問，讓你三年五年去受苦，不來



理你，就是心血來潮時提個人去拷問或殺害。浙贛鐵路的一個叫竇文浩的，被毒打成了殘廢，新四軍的政工人員王成被活埋，李芝芳秘書被槍殺了。……尤其是女性政治犯，大部被姦污，有個上海女青年鄒琳，就是因為被輪姦致脫肛而死在營裡的。」又據記者東流在其通訊中敘述上饒集中營殘酷情況稱：「被他們判定爲「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對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薰或者由幾個人扶到荒山古廟的毛家嶺。到了毛家嶺又上腳鍊，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維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櫥」，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地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以至連有些看守的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

以上所引只不過是在報紙雜誌中，透露出來的特務罪行之一角，其實際的殘酷驚人，是遠超出這些片斷的記載以上不知若干倍的！

自政協會議蔣介石公佈四項諾言後，這些特務機關不但未釋放各地「政治犯」，反而把無數進步人士與共產黨人秘密處死，以圖滅跡。據稱在西安南郊等地被秘密處決之「政治犯」不下四百餘名，僅某村山溝裏一次被處死者即近百名左右，均斬斷手腿，砍殺頭顱，至使屍身模糊無法辨認。在武漢也經常有人見到特務機關於夜晚向江中投擲許多黑麻袋，所裝亦爲「政治犯」；此類事件，各地續有發現。同時各種特務暴行也更花樣翻新，變本加厲。他們爲了摧殘言論自由，搗毀了重慶的「新華日

報」館和「民主報」館，搗毀了成都的「新華日報」分社和「民衆時報」館，搗毀了鄭州「民主報」分館，搗毀了廣州「華商報」，「正報」等分館，「兄弟圖書公司」及「正大」，「國華」，「光明」等書店，搜劫一切書店報攤封閉雜誌，出版社共四十三家，搗毀了「西安秦風工商日報」館，繼又三次縱火，復藉故捕殺其法律顧問王任律師，並迫使該報停刊，搶劫了瀋陽「新華報」籌備處之印刷器材，查封了「文化導報」，並下令逮捕該兩報所有工作人員，非法拘捕北平「解放報」工作人員，並查封該報，同時一次被查封之書報通訊社竟達七十七家之多！其他如逮捕記者，毆打報販，查封、搗毀，沒收進步書報等案件，則數不勝數。

他們爲了破壞和平民主，搗亂了滄白堂會場。毆傷許多民主人士；製造了較場口血案，打傷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六十餘人；搗亂了北平調處執行部；製造了北平中山公園血案，打傷教授陳瑾昆、江紹源及美新聞處北平處長福斯特等多人；製造了各地的反蘇反共遊行，同時對深明大義未參加遊行的學校和學生橫施殘暴，搗毀了成都燕大校門，慘打綿陽六中學生，捕六人傷九人，毒打四川合川中學學生，毆傷數十人，二人垂危。……最近又製造了南京血案，毆傷滬各界人民團體爲反對內戰。晉京請願代表馬叙倫、閻寶航等及新聞記者多人。

同時爲了摧殘教育事業，復且特務毆傷教授洪深，川大特務凌辱教授李相符、陶大鏞、彭迪先，北平臨大及南京臨大學生被捕許多人，陝西西北大學八十餘人被開除，三十餘人被捕押，渝北泉立行中學學生被特務槍擊，七人受傷二人失蹤，江西玉山國立三中亦被特務用機槍掃射，死一名，傷三十餘名，三名失蹤，濟南各中學師生被捕者達二百餘人之多。

他們爲了破壞工人的合理要求，更大事槍殺，濫捕工人，僅三、四月份在重慶一地就製造了軍政

部第二紡織廠慘案，工友被槍傷四人；製造了中國毛紡織廠慘案，槍傷工人二十餘人，重傷數人，三人因傷斃命，被捕十九人，二人冤死獄中；製造了大渡口兵工廠慘案，工友前後被槍殺六人，重傷八人，輕傷無數，被捕及失踪者不斷發生，被暗害投屍入江者已發現多具；而另一兵工廠（忠恕沱第十廠）被捕工人竟達一百一十餘名以上。

此外暗殺案件更層出不窮，他們暗殺了東北抗日英雄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將軍！暗殺了四平街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于樹中；暗殺西安教育界名流李敷仁；在南通慘案中暗殺了孫平天、顧迅逸、孫日新、鄭英年等，割舌、挖眼、挖鼻、割耳然後拋置江中，繼又暗害錢素凡等多人，一時被捕之學生、教師、記者，文化人等共達七十餘名之多！（見文萃二十六期，消息半週刊二期）最近在昆明竟於三天之內暗殺了民主運動領袖李公樸和聞一多，並準備繼續在各地暗殺民主人士，西安特務機關也正準備大規模的屠殺，『黑名單』中有民盟人員、地方士紳、教師、學生，及新聞記者多人，該地已成鬼蜮世界！（見民主報五、二十八）

其次，「軍統」與「中統」對解放區的破壞工作，更是罪大惡極，殘暴萬端。如一九四四年六月戴笠就會下令給其「忠義救國軍」說『對於共匪盤踞三個月以上村鎮，於我軍收復後，須將村鎮居民一概殺死毋宥』，就在這種命令下，該軍血洗了解放區許多村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月，由「中美合作所」訓練出來的特務，會組織「華北先遣縱隊」領頭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組織「山東別動支隊」，傾力向山東解放區進犯，並潛入魯南進行破壞，在綏遠組織「中美武裝別動隊」配合傳作義軍向我進犯，並在綏西暗殺我工作人員。

至於派遣特務潛入解放區內部進行破壞、暗殺、放毒等活動，數年來層出不窮，即以陝甘寧邊區

而論，人證物證俱在，有案可稽者不下數百名，僅一九四一年冬由西安一西北特偵站一派入遼區，漢中「特訓班」一地畢業的特務就有五十一人之多。今年以來，此種活動愈演愈烈，例如山東渤海區十二縣，三月間曾發現匪化特務八十餘股；據不完全統計，僅濱海區從一月至四月中旬，被特務暗殺之區村幹部竟達千人以上，如中原解放區，僅四月中旬就發現十一個特務在官河、磚橋等地放毒五十二包，我軍民中毒者達一千三百餘人，不治而死者已有三十餘人。又如晉冀魯豫解放區，僅博愛一縣就發現國特黑槍手達六百零六名，據不完全統計，僅洛縣三個村即被暗殺二十一人，臨漳一縣被暗殺二百餘人，而安陽十、六兩區僅三月上旬半個月內；即被暗殺六十七人之多！近來「軍統」，「中統」復以「難民還鄉」名義組織五花八門的匪化特務組織，成立「暗殺團」、「還鄉團」、「難民隊」、「義勇隊」、「復仇隊」、「政治警察隊」等，發給武器，遣回解放區各縣，進行武裝暗殺、破壞，這種武裝特務組織已由河北各縣蔓延到山東山西及華中解放區，據說陝西的特務機關，也正在準備劾法。

這些特務機關為反共反人民，在抗戰期間，竟喪心病狂不惜勾結敵偽共同進行血腥的屠殺。如一九四五年春「軍統局」「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就會赴上海與偽軍訂立共同進攻新四軍的密約，並由該軍供給偽軍以軍火。而大漢奸如陳逆公博、周逆佛海、梅逆思平、杜逆錫鈞、繆逆斌、王逆英、李逆守信……等，無一不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淪陷區反共的代理人。他們不但能舉出軍統中統給他們的反共特證件，而且能歷述他們無數的反共「功績」。如陳逆公博之妻李勵莊在為陳逆聲請覆判狀內，就曾供出「軍統」與陳逆共同反共之鐵證，該狀內稱：「三十四年三月間戴局長接獲被告（指陳逆、下同）實行「剿共」報告後，曾將全國共軍佈置地區番號及指揮官長姓名詳表一份（共蠟

紙二大張）發交徐天深同志轉交被告參考，被告並即參酌該表置三省防務，東南之不受「共禍」，實基於此。同年六月間，「中央」（指國民黨反動派頭子）來電：「中電悉，希即轉囑周進（陳逆化名）以私人名義轉告劉啓雄、孫良誠、吳化文等，目前應嚴密部署，協力剿共，並囑其對楊揆一、任援道、項致莊、劉國鈞等偽部，積極設法進行策動掌握，以便適用必要時「剿共」……」並稱：「以上往來各電，軍統局均有案可稽，參與此秘密者，如陳中平、徐天深二同志可查查詢。」（見北平新生報五）十一）。

爲了破壞在敵後堅決領導抗戰的共產黨，和殺戮淪陷區廣大的愛國人士，不但是大漢奸兼營「國特」，而若干「國特」也奉命乾脆去當漢奸。以「軍統局」而論，如戴笠子弟兄之一的陳恭澍曾任敵偽特工上海區長和偽國際情報局長；戴笠的親戚及其重要幹部王天木，直接受敵憲兵隊指揮曾任偽「華北工作團」副團長；「軍統局」上海「忠義救國軍」負責人萬里浪，曾歷任敵偽滬杭等地特工負責人兼偽政治保衛局長；其他如偽特工江蘇區副區長及偽政治保衛局主任秘書陳彬，偽杭州政治保衛局秘書畢高奎，偽特工總部處長及偽南京憲兵副司令馬嘯新，偽特工總部科長及政治保衛局副局長吳順生，偽山西急進建設團副團長聶士慶（原該局山西站長），偽山西「剿共」軍第一師長張子雲（原該局武鄉組長），偽新五軍參謀高英奇（原該局新鄉組長），偽興亞團長及大青山順團總司令李維業（原該局大同組長），以及偽興亞巡撫軍參謀長張毅三……等，無一不是軍統局的重要幹部。這些罪大惡極，殺人如麻，兼帶漢奸與「國特」雙層頭銜，專門反共反人民的劊子手，便是國民黨派遣的所謂「地下軍」。

直到現在，中國法西斯派並未放棄其勾結敵偽共同反共之陰謀，據「華西晚報」二月十一日載：

原華北日軍大本營的特務機關「宮條公館」已被「軍統局華北分團部」接收，其主要負責人森田少校及岡野松等多人，竟被委爲十一戰區黨政總隊「校」字號軍官；殺人不眨眼的北平日本憲兵隊及其隊長長穗上校，亦被破格重用待如上賓。而「中統」特務孫耕曉竟勾結日本法西斯殘餘勢力及偽滿漢奸，如田友（原名藤田，敵一二九師團參謀長）、阿部、三好、近藤及姜際陞、劉靖宇等，陰謀在東北通化發動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武裝暴動，企圖消滅當地民主政府，建立中日聯合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以上所述僅爲「軍統」與「中統」血腥罪惡之一斑。其他如貪贓枉法，敲詐勒索，姦淫擄掠，橫行霸道等罪行，已是人人盡知，無庸贅述了。

人民的血是不能白流的，十幾年來國民黨法西斯恐怖的血腥統治，教育了中國人民如何用最大的仇恨仇視這些人民公敵，也教育了中國人民要如何用集體的力量粉碎這些特務組織。同時就是特務組織內部，除了一部份喪心病狂毫無人性的特務頭子以外，很多是被這些特務機關藉名招生以及欺騙、強迫、威脅、利誘而陷入泥坑的失足者。這些下級特務不但毫無自由，時時受監視，而且隨時有被禁閉、暗殺、身受極刑的危險。因此他們在自由民主的大浪潮之前和他們本身的痛苦生活之中，他們也在喊出了：『我們也沒有自由，有的是殺人和被殺的自由，我們也要民主，因爲我們也是人呀！』『時代是不容許我們再活動下去了！我們不願再做人民的公敵』的呼聲。他們『甘願做一個爲中國人民所諒解的懺悔者，而因之被死者的鬼魂，也不願意繼續做特務爪牙，再過罪惡的生活』（見昆明「學生報」七期及「中國週報」九期）。

但是中國法西斯派的恐怖武裝是不會自動放下的，因爲他們深知專政獨裁，離開了特務統治就等

於宣佈了死刑，因此，全國人民要為徹底消滅法西斯的恐怖統治而鬥爭！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大秦日報」）

## 孫科的眞面目

克 方

今年四月南京憲政府改組時，蔣介石丟給了孫科一根肉骨頭，從此『孫院長』一躍而爲堂而皇之的『孫副主席』了。對於這個，我們的孫院長似乎還有些『悻悻然』，在接見記者時，他更外冷淡的說：『副主席職權不過是當主席出缺時代理而已，此外並無規定。』然而，在內心裏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但是『受寵若驚』，而且還在『感恩圖報』呢！你不信吧，請看他近來接見記者就忙得不可開交：日前接見了合衆社遠東區副經理范麥利（注意：是美國人），七月二十二日又接見了美聯社記者（注意：又是美國人），一再發表談話。

『打滾戰術』的驚人表演！

談些甚麼呢？劈頭就罵：『共產黨已經全面叛亂』。又說中國的內戰是『因爲在蘇聯方面不能使美國在中國的而努力成功』。並且譏諷蘇聯：『積極培養中共的力量，使中國人打中國人，企圖得享東北特殊化的成果。』而且『這種作法與九一八時日本人的作法有甚麼兩樣？』接着他又放了一炮，想來吓唬美國人，他挑撥的說：『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由東北而起，因此，如果東北的局面不能澄清，可能引起又一次的世界新戰爭！』

不過在這裏，假如你認爲他真的會挺身而起抗擊蘇聯，那你就大上其當了；因爲孫科的目的不過是『借美國錢，打中國人』而已。他的所謂蘇聯如何如何，三次世界大戰如何如何，不過是對美國人使用的『激將法』罷了。可不是嗎？你看他在千言萬語後畫龍點睛說：『擺在我們中國人自己面前的



問題怎樣解決？」『就要美國加強經濟援助中國』，而且還撒嬌放賴恬不知恥的說：『假如美國對這一要求的『反響冷淡，即等於對中國的放棄，而在中國的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另外却又給了美國人一顆定心丸：『在軍事方面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黨，否則即是共黨推翻國民政府。』

『大人得跟小孩學』，陶行知先生的這一信條，不意在這裏證實了！你看，孫科這場驚人表演，和小孩子在大人跟前慣耍的『打滾戰術』不是一模一樣嗎？

他昨天是怎麼說的？

多少年來，孫科——這個偽善的騙子，竭力裝璜着自己，他在人民的面前，掛上了連串的美麗而時髦的招牌——『國民黨左派』呀，『民主運動領袖』呀，『自由主義人士』呀！『親蘇、聯共分子』呀，『三民主義忠實信徒』呀等等，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大家看看，孫科昨天是怎麼說的吧！人們假如不健忘的話，一定可以記得就在去年的三月，孫科在廣州答覆一個記者的疑問時，他承認自己是『國民黨左派』，並且說：『最好大家都左，這樣就不會有糾紛了。』他在廣州學生的歡迎會上說：『今後中國政治的動向，就是實行政協會的決議，政協會的決議是一定能夠實現的。』（大鼓掌）又說：『人民生活痛苦極了，誰也不願再打仗，全國人民都盼望着和平』。『但求和平要有方法，有些人想以武力去求和平，這是錯誤的，這只有愈加破壞和平。取得和平的正當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民主！』（大鼓掌）他又說他『非常景仰蘇聯』，勸大家『要學蘇聯的樣。』

就因為這些虛偽而誘人的詞句，孫科不但贏得了千百學生們的大鼓掌，而且博取了『民主的化

身」、「最堅韌最忠貞的民主戰士」的歌頌（大會主席歡迎詞）。

可以想像得到，假如人情把孫科昨天與今天的話對照起來一看，一定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都會感覺是作了一場夢！但是，也正因這番對照，才使得這個偽善者，變節漢，政治騙子手和朝三暮四的傢伙，在萬目爛爛的人民面前，顯出自己的嘴臉，露出自己的尾巴，而無所遁其形，歷史的照妖鏡，就是這樣無情而公正的。

### 特殊功效

大概中國統治集團的各色人物，也像舞臺上的戲子一般，有其分工合作的妙用吧？你看，有的打大鑼，有的敲邊鼓，有的裝紅臉，有的裝白臉，所謂『相反相成』，想來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有幾種敲邊鼓和裝白臉的人物，是給蔣介石幫了大忙的。自稱『過河小卒』的胡適之流是一類，『小打大幫忙』的大公報是一類，而『國民黨左派』的孫科則是又一類了。

舉例來說，抗戰以後的孫科，平日總是表示『進步』，不時在中蘇文協裏唱些滿好聽的調子的；但是一到蔣黨統治的緊急關頭，他就不惜搖身一變，露出吃人的獠牙來。一九四一年正當蔣介石劊子手們在皖南喝了新四軍的血之後，全國人民都為這一血案所震怒，而代表中間勢力的各小黨派都跑到香港結成民主政團同盟，致使蔣黨處於空前孤立的時候，蔣介石着慌了，孫科就立即跑到香港，大罵中共『叛亂』，大罵民盟『破壞團結』，着實幫了蔣介石一手。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蔣介石打了一個如意算盤；他以為美國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壓服下去，於是他便可以組織大元帥府，進行投機，自己也就可以居在大元帥府裏大吹大擂，故立刻對德日意宣戰。及至珍珠港失敗消息傳出後，蔣介石心灰意懶，大元帥府也不組織了，對日德意宣戰的郭泰

琪也撤職了，甚至對二十六個聯合國的簽字都發生了動搖，勉強簽字後，覺得一無所得。於是孫科就奉蔣命對美國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草獨殫和！」這是孫科勒索美鈔而使用「打滾戰術」的一個範例，而且是奏效了的。

在目前，蔣黨面臨空前毀滅的危機，而「乾爸爸」的五億美金貸款偏偏還在掉胃口，不但宋子文這個美國老掮客沒有拿到手，就是山姆大叔引為「滿意」的張群也沒辦法，這可使蔣介石着急了，怎麼辦呢？「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於是哥倫比亞的孫科博士挺身而出，將他那套「打滾戰術」，再來一次精采表演。這也就是孫科們的「特殊功效」。

#### 投機取巧的官僚

正如新華社時評所說：「在中國國民黨的一切官僚之中，孫科是最為寡廉鮮恥反復無常的丑角！」其實，孫科的這種本質，是有其深長的歷史根源的。大家知道：他從小就是一個執袴子弟，藉着孫中山先生的庇蔭，求學從政，都是一帆風順。早年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得碩士，因之他與山姆大叔的關係是頗為親密的。民國六年，孫中山在廣東組大元帥府，「太子」孫科即任機要秘書。民國十年改任治河督辦。十一年高陞廣州市長，聲名狼藉。十三年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指定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孫科即為其中一員，似乎是很「左」了；可是，當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不久，他馬上就背叛他父親的遺囑，與鄒魯、張繼等勾結，參加極右翼的西山會議派，進行反對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的勾當。

但到民國十五年，眼看西山派的沒落和革命廣東的有利可圖，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他又表示「進步」，結果騙取了一個第二屆中執委，而且還先後充當了廣州市長、廣東建設廳

長，兼代省主席等職。當此之時，這個革命販子顯然是飛黃騰達紅得發紫，着實嘗得了『投機』的甜頭了。

大革命中，他又投入左派的武漢政府，並且攫取了交通部長的肥缺，大發其『革命財』。但是當蔣介石發動『四、一二』苦迭達以後，他又和汪精衛積極向右轉，參與了可恥的鄭州會議與『清黨』會議，發動了血腥的『七、一五』政變。然後他又跑到南京，拜倒於蔣介石黑披風之前，尋求一官半職。結果果然在特別委員會裏抓得了財政部長一席，並且狠狠的撈了一把。但是好景不常，接着又貶為國府委員，考試院副院長。乃又不甘清苦，千方百計，才嘗到了鐵道部長一贊。

民國二十年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於南京，孫科之流也大受排擠。『南天王』陳濟棠乃與西南國民黨中委古應芬、萊佛成等標榜『反蔣』；不久孫科就追隨胡漢民的尾巴，到了廣東，召開甚麼非常會議，另組政府。但到『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反蔣風潮瀰漫之時，孫科和蔣介石們爲了保牢自己不穩的統治，又在上海開會，言歸於好了。十二月廿一日蔣介石被迫下台，孫科就替蔣出面，支持殘局，坐上了行政院長的交椅。可是爲時僅僅十四天，又被蔣介石汪精衛打下台去。

廿二年以後打入立法院的『冷宮』，飽受蔣家排擠，似乎是『左傾』了，但又主持制訂了臭名遠揚的五五獨裁憲草。抗戰期間被蔣介石集團擠得無路可走，又表示向『左』，擔任中蘇文化協會的主席，並戴着親蘇的面具，訪問了一趟蘇聯。但是這個隨風倒的傢伙自日蘇協定以後，即一轉而發表親英美的言論，但不旋踵就遭受復興、CC的猛擊，亦云苦矣。之後，即一直失籠，直到政治協商會議的開幕。

貪污起家的大資產者

孫科投機取巧寡廉鮮恥的特性，不但有其歷史根源，而且有其經濟基礎，雖說他平日貌爲清高，似乎是一條不吃屎的狗；但是，究其實際，遠在廣州、武漢時代，他就變成了一個以貪污起家的大資產階級。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略舉一例，即可證明。

民國二十年六月二日何應欽等九將領致電孫科有云：『或謂兄之毅然赴粵反蔣，雖種種託詞，然其重要動機，則純因經濟關係。蓋兩三年來，鐵道部搜集各路之款，月逾二十萬，如何保管，如何用途，全屬秘密，向無報銷，見欲一走了事，化公爲私，及行抵上海，預料粵變，深知足以影響市場，乃又由兄之外庫和豐銀行，大營公債之投機，不逾旬日，所贏已數十萬，……證以往事，兄在廣州市長任內之聲名狼藉，在武漢時代，則需捲交通部及部府餘款數十萬，從無報告，而劃入私囊。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則利用財政部長之職權，扣存李任潮所應領之庫券百萬，要求分肥，迄今尙不肯交出。凡此諸端，皆證據確鑿，人人皆知。』（見國聞週報九卷一期）何應欽自來爲蔣黨要人，且又爲當事人之一，因之此一揭發，必非道聽傳聞可比。

自然，今天孫科的資產和四大家族來比，那是『小巫見大巫』，這是因爲他十餘年來的『冷宮』生活，欲想撈一票而不得。但是這也不是說，他就毫無油水可撈了，除掉立法院的公帑之外，偌大的一筆中山文化教育基金，十餘年來，就是孫科的專利品，誰又和他去算過賬呢？

俗語說：『吃屎長大的狗，總忘不了吃屎的路』，孫科既是以貪污起家的大資產階級，這就使他『不甘寂寞』，念念不忘於權位與勢力，因爲權位與勢力就是貪污之門呵！因之，這就決定了孫科的根本政治態度，那怕他七十二變，也變不掉他這條大資產階級的尾巴！

蔣介石的殉葬者

多少年來，孫科利用了人們健忘的弱點，在群眾中造成了幻想，人們似乎感覺到孫科和蔣介石之間，會有些差別，這當然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比較清楚根底的人，雖然明白孫蔣之流不過是『一丘之貉』，但還認爲這次孫科的『榮任』副主席，大概是蔣介石準備在垮台之際，自己來一個『引咎辭職』，下野出洋，以謝國人，而把孫科這張牌推出來，以便籠絡人心，收拾殘局，再和中國人民來『政治協商』。在今天看來，這種估計也落了空。

歷史上的帝王在臨死以前，是要指定一批寵姬愛妾以及左右親信來殉葬的，而這些寵姬愛妾以及左右親信似乎也深感『皇恩浩蕩』，因而願以身殉，死而無憾的。在今天中國的蓋世魔王蔣介石是注定要死亡了，現在他也安排了一大批的殉葬者，CC、復興、政學系等自然要奉陪，青年黨、民社黨，以至孫科之流，也在指定之列。結局呢？這之中有些人也許會深感『皇恩浩蕩』願以身殉死而無憾的；但是，根據孫科的『本性』看來，他是不會這樣『愚忠』的，也可能還要『進步』，然而『可惜』得很，今天的時代不同了，人民不是長久可欺的，因之，歸根結底，孫科的命運，還是蔣介石的殉葬品！

## 「國防部長」的代價

高 三 雲

『忍令上國衣冠，淪爲夷狄？相率八桂（廣西別名——筆者）弟子，還我河山！』這是三七年白崇禧『進京謁蔣』時，對一位青年記者表示的『素志』。然而，曾幾何時，却『忍令華夏衣冠，淪爲『美式』，相率八桂弟子，殘害人民！』假如不是『貴人健忘』，能不愧對初衷？

據說白崇禧是一個『足智多謀』的『軍事家』，而且還是『第一流的參謀人才』，因而獲得『小諸葛』的美稱，他在廣西第五期軍校結業時，也曾自稱過：『人家說我『小諸葛』，軍事上頂呱呱，其實也沒什麼，不過比一般人好一些罷了！』是的，白崇禧豈僅『比一般人好一些』，而且『出色』萬倍，試問：東北軍、西北軍、川軍、滇軍、粵軍、晉軍、黔軍……一切雜牌軍的將領，有哪個能像白崇禧那樣在出賣了自己的弟兄，朋友以後，居然當上堂堂的『國防部長』？這也許是『小諸葛』『神機妙算』的表現吧！但白崇禧當『國防部長』代價是什麼呢？開始抗戰時，他和李宗仁不是會擁有一支名震一時的『第五路軍』嗎？該軍共轄兩個集團軍（十一和二十一），計四個軍（第七、四十八、三十一、八十四），另外在廣西訓練的四十六軍（已被蔣系特務所掌握，後駐防海南島，現調至膠東參加內戰）及地方團隊，總數三十餘萬。然而，在蔣介石消滅（第七軍及四十八軍在上海會戰失敗後撤時，許多部隊均被蔣嫡系軍繳械），分化（如四十六軍之被控制），隔離（如第七軍調蘇皖邊，四十八軍調豫皖邊，八十四軍留駐豫鄂邊），取消（如三十一軍在徐州、武漢、鄂北等數次大會戰後，毫不補充，且取消番號，改編，遣散），限制補充（兵源由蔣政府指定必須從廣東抽壯丁補充，武器

則始終是抗戰前的『模範式』、『七九』。』以及加強特務活動，直接命令桂軍進攻解放區，使其與八路軍新四軍『兩敗俱傷』（如泗城、兩淮戰役，七軍即有數千人無謂犧牲）。……毒辣辦法，弄的桂軍七零八落，現在剩下的已不及過去五分之一了，可見要當一個『國防部長』，的確是要化費很大的批血本呵！這裡，筆者以一個廣西人的心情可以斷言：桂軍弟兄和廣西父老，在十多年的血淚教訓中，已逐漸認識到所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所謂『三自』『三寓』政策……的把戲，都是葬送廣西人民，投入專制懷抱的醜惡招牌，使數十萬八桂弟子的流血、犧牲，毫無代價，他們再不抱任何幻想了，廣西人民是會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找到生路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大眾日報」）



## 孫匪立人是怎樣起家的？

孫立人安徽人，美國琴尼亞陸軍學校畢業，抗戰前任宋子文之稅警團長，當時被稱為宋子文之十條虎之一。『八一三』松滬之役稅警團被打垮以後，至武漢改任財政部鹽務緝私總隊長。一面誘致流亡青年學生，在長沙岳麓山訓練，不久又開到貴州都勻，訓練了三年。

起初鹽務緝私總隊共兩個大隊（第一大隊和第三大隊），後改稱團，並又成立了第二團。第一團長賈幼慧，第三團長葛南彬，第二團長唐守治。另外還有直屬中隊（通信、工兵、輜重……），李鴻當時是第三大隊副，訓練的機構是官警教練所，第一任教育長為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王之，教官中並有德國顧問，後任教育長即唐守治。其主要本錢是綽號『黑埔一期』的學員第二隊，學員都是高中以上學生。後來新一軍的基層幹部很多就是這一隊的。

在貴州時，孫還擔任過貴州第二綏靖區指揮官，血隕鎮壓黔南民衆，並利用這機會成立一個教練所，訓練當地保甲。

三十一年鹽務緝私總隊改編為新三十八師，開往印緬戰場。三十二年三月新一軍成立，鄭洞國任軍長，孫任副軍長，仍兼新三十八師師長。此時新一軍轄新三十八師，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師。翌年新一軍分爲二部，鄭洞國升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孫升任軍長。新二十二師則分出與十四師，五十師合併成立新六軍。新二十二師師長廖耀湘升新六軍軍長。

三十四年七月，新一軍返國。日寇投降後，開廣州受降。在廣州軍紀極壞，驕氣十足，民衆稱之

爲「新日軍」。

三十五年三月，新一軍調赴東北，（當時孫與何應欽參加國際參謀會議未回，職務由副軍長賈幼慧代理，孫五月返國。）在東北作戰連敗被免去第一軍軍長職（三十六年五月），任空頭的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五十師師長潘裕昆（新六軍系）升新一軍軍長，五十師師長則由該師副師長楊溫升任。新三十師師長唐守治免職（調軍部高參），新聞處長葛南彬也「病假」離職。這時期算是他最倒楣的時期。

但是三十六年魏德邁來華，經「美國爸爸」「推薦」，孫突升蔣匪國防部陸軍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賈幼慧也升副訓練司令），在臺灣訓練美械新兵，成爲美帝國號籠兒之一。

## 周佛海如此說

周佛海招認在他們公開出走投敵之前早已做着內奸的工作了。他說：「我和幾個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前，汪先生爲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湊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周佛海更說：「我們主張一面猛烈的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該絕，而且應該漸漸的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接洽停戰」。他還說：「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能全斷。這中間慘淡經營的經過，現在沒有到公開的時期，只好留待將來了。」這話更分明的說出，他們是鑽在抗戰陣營內，在黑暗中做着勾引敵人的工作，準備隨時出賣民族。

由此可見，這個漢奸俱樂部的活動當時並不祕密，並非不爲當局所知。但他們是否因此而被懲辦呢？沒有，不但沒有被懲辦，而且在漢口舉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汪逆精衛被推爲「副總裁」，而周逆佛海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了。周佛海如此說：「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都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却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只好勉強擔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了。」唉，唉，回想當年，抗戰初

明，我們老百姓時常恭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言論，未嘗沒有些漂亮的話，誰知道他早就存心在說鬼話，騙吹牛呢？誰知道他還在暗中另有一套「慘淡經營」呢？

（註）本文內所引周逆佛海的文章根據偽「新中國報社」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出版的「和運史話」。〔擇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消息」于來作「周佛海如此說」〕

## 大公報的尷尬

大公報以「大公」的態度出現於新聞界，幾十年的奮鬥獲得了不少的擁護者，而且也得到了美國的新聞學院的獎狀。雖然以中國的民間輿論代表者自居，但稍微知道一點該報內幕的人，就知道這是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所創辦（從一位滿洲人英君那兒頂過來的），也就是政學系的機關報。然而這幾位創辦人之間據說有着一個約束，即是如果有人要從事政治，就得放棄報紙，因此，吳鼎昌名義上是放棄了報紙了的。自然，實際的情形，則是誰也不知道。

張季鸞死後，報紙即為胡政之一手獨攬。寫社評的是一位王芸生，這也是一位名手，大公報的社評素以感情流露手法老到著稱，大都是他的手筆。

大公報的態度，的確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好像的確是一個頗「公正」的報紙。然而如果常久閱讀，細心的看，那差別是不難看出來的。說他是政學系的機關報，有一點即可證明：當接收東北之初，大公報首先派記者前往，報上獨家有着精彩的通訊，因為張嘉璈熊式輝就都是政學系的台柱，當重慶官場說着「政學系席捲東北」的時候，是連新聞領域也包括進去了的。（擇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消息」黃嘉璈作「大公報的尷尬」）

## 「大公」與「大剛」

從背景講，大公報與政學系淵源極深，雖然大公報老闆胡政之曾在重慶新民報用書面否認過。政學系在今日的政府（指國民黨政府）中有它不可忽視的地位，因為像張群與吳鼎昌者，其與蔣介石接近的機會，甚至連二陳的份子都要妒美的。因此，大公報即使不便稱為半官報，其與政府的一脈相連，可無疑義，特別是在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場合，其為政府發言，所發生的作用，實遠過「中央」、「掃蕩」而上之。

當大公報的三巨頭之一張季鸞在世時（其他兩巨頭是胡政之與吳鼎昌），重慶每有大事，蔣介石常以電話相召，有時就在汪山的蔣介石的府第過夜，特備一榻，相對傾談，使張氏得時機之先。張氏多才而富機智，為蔣介石提供謀略，回報館便撰作社論，透露一二，使大公報身價十倍，這是幾年來「大公報」的獨特成功之處。（擇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消息」耳東作「『大公』與『大剛』」）

## 編者聲明

- 一、這個續編的「孫科派」等三小節爲「蔣黨內幕」的正文的最後三小節。
- 二、「附錄一」爲原作者翊勳所作附于正文之後者。
- 三、「附錄二」爲編者所蒐羅之有關的材料，有的時間性已過，有的爲在蔣黨統治區所出版之刊物所載，故措詞、口吻均須適合當時當地情況；並且，材料多屬零碎，立場觀點亦缺乏嚴格的明確性，附錄于此，僅供參考而已。